

理論化大氣警戒中的「運動」： 香港流水革命中的情動主體化與軀體參與*

梁皓晴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催淚瓦斯是當代都市維安中常見的「大氣警戒」(atmospheric policing)武器，透過空氣滲入身體每一處孔隙進行鎮壓，使其失能，進而剝奪抗議者的呼吸與公民權利。本文承接政治地理學者Mikko Joronen的「負面球域棲居」(negative sphere-dwelling)概念，以及環境人類學者Tim Ingold關於「在天氣世界中棲居、尋路、感知」的論述，進一步探討大氣暴力中的「運動」(movement)本身，追溯香港流水革命抗議者如何在毒氣的湍流和惑亂中，展露多樣的情動主體化(affective subjectification)路徑。大氣警戒雖然帶來壓迫，卻也激發生成性的政治動能。對此，我從情動理論及女性主義思想家Sara Ahmed、身體人類學者Annemarie Mol的現象學取徑切入，強調抗議者以脆弱之身穿越大氣警戒，展開情動的重新定向與意義轉化。特別是，「食催淚彈」與「如水抗爭」這兩個物質隱喻凸顯流水革命中兩種關鍵的「身體—環境」共構模式：其一為「呼吸—情動具身化」(breathing-affective embodiment)，其二為「軀體—物質參與」(somatic-material engagement)。兩者闡明了抗議現場中知覺感知與都市環境的互為塑造，為我們重新思考社會「運動」與物質纏繞之分散式集體政治，提供一個反思性的「情動—主體」理論基礎。這種關注呼吸、更「接地氣」(down-to-

投稿日期：2025年7月30日 接受出刊：2026年1月9日

*謝辭：本文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香港流水革命的大氣／氛圍政治：從「運動」及「風化」兩個理論視角切入》(2025)部分內容，唯分析架構已大幅修改。寫作期間，非常感激陳怡君提供寶貴的建議、協助和陪伴，從人類學角度與我就本文的理論框架和田野書寫展開深入討論。另外我也感謝蕭冠祐的評論。在稿件修改階段，感謝匿名審查人不吝提供精闢的修改建議，有助筆者更清楚呈現本文論證如何與環境人類學、身體人類學等理論場域形成對話。在定稿階段，亦感謝Billy Tang提供的編修意見。最後，我衷心感激田野調查期間在香港、臺北相遇的所有受訪者，謹致謝忱。

earth) 的「運動」視野，亦有助批判既有抗議政治研究中過度結構化、僵固且靜態的理論模型，以捕捉當代都市抗爭中身體、環境、物質與技術之間動態的共構及實作關係。

關鍵詞：身體人類學，大氣警戒，社會運動，香港流水革命，情動主體化

一、前言：大氣警戒下的人與環境關係

所有針對生命的戰爭，都是從奪走呼吸開始。

— Achille Mbembe (2021: S61)

二十一世紀的都市抗爭與維安的樣貌，與傳統模式截然不同。國家從單純依賴言語威嚇、警棍、盾牌或實彈鎮壓維持公共秩序，轉向廣泛運用催淚瓦斯、胡椒氣霧、臭鼬水、長程聲波裝置等手段，透過空氣滲透至抗議者身體每一處孔隙，進行全方位的感官控制與鎮壓。此類轉向「量體治理」的政治暴力樣態，論者稱之為「大氣警戒」（atmospheric policing）；這種技術配置特別強調將環境武器化，並以具有化學—情動物質性的空氣本身作為傳導介質，達成傳統武器難以實現的空間殖民（Feigenbaum and Kanngieser 2015: 81）。其中，催淚瓦斯讓「不服從」或「不聽話」的抗議者難以正常呼吸、無法駐足聚集，將其驅離於公共空間之外，他們不再被視為擁有發聲權的政治主體，甚至連作為「允許存在於空間之實體」（an acceptable entity within a space）的資格也被一併否定（Kenner et al. 2019: 154）。因此，當群眾被大氣警戒驅散時，不僅意味著單一抗議行動的終止與呼吸的暫時懸置，更指向都市歸屬與公民權利遭受剝奪。

透過改變特定場域的物質性組構，催淚瓦斯在抗議現場營造了充斥敵意和危險的情動氛圍（affective atmospheres）。它之所以具有突如其來且難以辨識的暴力特性，正是源自氣霧的易變性與空氣無所不在的滲透性。Nieuwenhuis（2016）指出，唯有當空氣的物質性突然崩解、不再「自然地」運作之時，人們才意識到其背後隱含的「不可見政治」——呼吸困難讓周遭空氣展露其「重量、物質性和外顯真實性」（Nieuwenhuis 2016: 7）。此時，大氣警戒的治理對象已從個體肉身擴延至整個環境的工程（engineering），從根本上塑造和改變生命及其生存與行動場域（milieu）之間的感知關係，導致目標產生「不由自主」的認知混亂與情動衝擊：

吸入催淚瓦斯和其他非致命性氣體，會產生一種物質條件被改變的微氣候，使受害者身體受到高強度的疼痛刺激，觸發呼吸道、肺部腺體與肌肉的非自主和自律性反射動作，強迫身體改變呼吸模式，陷入部分甚至完全失能的狀態。（同上引：12）

目前，「大氣警戒」已在地理學、人類學、文化研究，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等多個學術領域引發廣泛關注及討論。De Larrinaga（2016）探討了催淚瓦斯的演變歷程，從二十世紀初歐洲毒氣戰的新興軍事武器，逐步轉化為全球各地國內警務中「較為人道」與「非致命」的治理技術。儘管《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明文禁止將化學鎮暴劑作為戰爭工具使用，主權國家卻傾向在法律詮釋與執行層面上採取彈性操作，配合都市維安的實際需求，實質上模糊了「戰爭」與「執法」的界線（de Larrinaga 2016: 523）。尤其在新自由主義治理體制下，這種彈性主權實踐讓殖民時期的軍事鎮壓邏輯在當代警戒行動中以新的面貌延續（同上引：524）。Nieuwenhuis（2017）則指出，大氣警戒將空氣轉化為可控的治理媒介，重塑了國家的环境治理模式，也動搖人類中心主義的法律概念。呼吸作為維繫生命的基本功能與「具生命活力」的標誌（marker of animated life），在「氣化」（gassing）之下成為主權權力加強控制、調節與重構的對象（Nieuwenhuis 2017: 13）。催淚瓦斯揭示法律如何規範個體的身體，也延伸至身體賴以生存的環境條件，從而決定「誰的生命權受到保護，誰的權利被中止；誰被允許呼吸空氣，誰則被剝奪；誰被納入法律之中，誰則被排除於外」（同上引：8）。¹

1 De Larrinaga（2016）、Nieuwenhuis（2017）等大氣警戒論者的傳柯式表述，以及下述 Joronen（2023a）「負面球域棲居」的大氣否定性視角，與近二十年來政治哲學、人類學對於「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的討論相互印證。相對於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主要關注「知識／權力」對生命各方面進行管理和增益，Mbembe（2003）認為「生命權力」的概念不足以說明主權如何將殺戮部署為治理核心。尤其在種族主義、戰爭與殖民佔領等常態化的例外狀態下，主權運作乃是在法律之外行使權力，其中「對死亡的分配」體現為界定「誰 [的生命] 重要、誰不重要，誰可被丟棄、誰不可被丟棄」的能力（Mbembe 2003: 27；也可參見 Graham 2015; Joronen 2023b）。至於人類學者 Elizabeth Povinelli（2011）在其著作 *Economics of Abandonment: Social Belonging and Endurance in Late Liberalism* 中，則把「死亡政治」延伸至分析澳洲晚期自由主義（late liberalism）國家如何通過文化肯認政策、緊急狀態宣告和生產「差別化的遺棄區間」（differential zones of

從早期學者追溯大氣警戒之殖民與軍事起源（Sloterdijk 2009）、其全球化研發網絡與生產鏈的鉅觀分析（Feigenbaum 2017），到這些鎮壓技術在國家治理與主權擴張中所承載的法律和政治意涵（de Larrinaga 2016; Nieuwenhuis 2017），相關研究於近年逐漸轉向，開始關注催淚瓦斯在特定警務場域和抗議現場的戰術部署，以及它與抗議者身體的交纏（Zee 2022: 166-171）。Cachelin（2023）指出，自美國建國以來，黑人身體在法律刑罰與文化論述上長期遭受他者化及去人性化，經常被視為「野蠻」、「危險」，以鞏固其奴役狀態並作為國家暴力的合法性基礎。這種種族化治理邏輯延續至今，持續形塑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者的形象與實際遭遇。黑人平民George Floyd 被警員跪壓頸部致死，在街頭呼喊「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的畫面，與眾多抗議者在催淚瓦斯中「喉嚨灼痛、呼吸困難、吸入有毒空氣」的經驗，皆具身地反映殖民思維和種族隔離權力結構在當代殘存（Cachelin 2023: 523）。同樣從種族政治視野出發，Leff（2024）將催淚瓦斯的技術創新置於美國警政軍事化與鎮壓策略演變的脈絡。自1960年代起（特別是針對黑人民權運動），催淚瓦斯的用途逐步從「驅散」轉向「懲罰」，廣泛應用於對付和平抗議者，讓當局「不再懼怕」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Leff 2024: 72）。防暴警察也發展出配合催淚瓦斯效果的「沸水戰術」：先封鎖出口包圍人群，再釋放催淚瓦斯，造成恐慌與混亂，使抗議者長時間曝露在毒氣之中，將城市街道轉變為露天監獄（同上引：73）。在這些時刻，大氣警戒以催淚瓦斯的腐蝕性煙霧與高溫火焰進行鍊金融合，「將物質性、象徵性與心理層面交織成一張令人恐懼的傷害之網，並作用於維繫生命的關鍵物質之上」（同上引：8），重新劃定、強化都市中「我者」與「他者」之間的政治邊界。

至於近年來以色列軍隊和警察在巴勒斯坦社區大量使用催淚瓦斯、臭鼬水與聲效武器進行殖民擴張和維安的實例，則成為政治地理學者Mikko Joronen（2023a）思考「球域棲居」（sphere-dwelling）存有論政治的起點。他結合現

abandonment）等方式，延續處於市場經濟邊緣的原住民、貧民、難民等「內部他者」長期承受的結構性社會傷害（Povinelli 2011: 13）。此一治理形式以多種時間性機制及倫理想像反覆劃定、模糊社會歸屬的界線，使邊緣群體滯留於貧困、疾病等致命條件，在日常中緩慢地忍耐「削弱意志卻不直接殺害生命」的耗竭暴力（the violence of enervation）（同上引：133）。

象學與 Sloterdijk (2016) 的球域哲學理論，主張把大氣／氛圍 (atmospheres) 理解為「場域球域」 (site-spheres)，進而探討「殖民暴力如何透過毒氣雲團所引發的呼吸暴力，使身體曝露於持續的干擾與隔絕中」，且催化更長遠的環境調適與壓迫機制 (Joronen 2023a: 766-767)。催淚瓦斯在特定社區熱點 (hot spot) 的反覆施放，構成了奪取居民呼吸與身體能動性的負面環境；臭鼬水則在移動的身體上留下難以去除的惡臭，污染目標的生活場域，都成為集體懲罰手段，形塑出殖民化的「動態身體球域」 (kinetic body-spheres)：

惡臭氣味的附著，切斷了被噴灑身體與其日常環境之間的連結，進而以令人厭惡的氣味折磨其身體。作為一種具有黏附性的腐臭氣體，它標記了特定街區，使生活空間變得難以居住，也將遭擊中的身體從原有球域中抽離。(同上引：772)

透過區分呼吸 (breathing) 與調適 (attunement) 兩種負面球域的具身化過程，Joronen闡明了以巴衝突的「負面界限條件」 (negative limit condition) 何以構成當地球域棲居的核心。雖然人類無法逃避「無法不呼吸」的根本限制，身體卻並非居於真空或穩定場域，而是持續與流變的球域互動連結。在殖民性的大氣中，身體的不可治理性 (ungovernability) 與球域自身的無能為力 (incapacity of the spheric) 彼此交織，構成雙向的脆弱。球域棲居讓「大氣的暴力秩序無法完全消耗個體的存在」 (同上引：775)。

事實上，人類學對於「身體如何在環境中棲居與感知」的討論並不陌生。人類學者 Tim Ingold (2000) 結合生態心理學與 Heidegger (1971)、Merleau-Ponty (1962) 的現象學取徑，主張「思考、知覺、記憶與學習等過程，必須在人與環境交互關係的生態脈絡當中研究」 (Ingold 2000: 171)。他從「棲居視角」 (the dwelling perspective) 提出，應把「有機體」 (organism-person) 視為浸沒於環境中的棲居者，其不斷開展的生活世界通過日常的種種關懷與實踐脈絡獲得意義 (同上引：153)。在後續論述中，Ingold (2010, 2011) 以熟悉大地與天氣、能巧妙閱讀萬物蹤跡的獵人為啟發，詮釋棲居者亦為「尋路者」 (wayfarer)：他們沿著運動的路徑生成感知，獲得智識，讓「生命得以活出，

技藝得以淬煉，觀察得以施行，理解得以生長」（Ingold 2011: 12）。這些尋路者之間的關聯，源於具身且共同浸潤於流動的物質媒介，而呼吸正是維繫所有生命的根本機制：「棲居於開敞之中，意味著居住於混融的天氣世界（weather-world）裡，每一個存在者都注定要將風、雨、陽光與大地納入自身的存續」（同上引：115）。

然而，Ingold關於「在開敞中棲居」、「在尋路中感知」與「環境作為感知媒介」的現象學分析，雖啟發了眾多追隨者，卻也受到感官人類學者嚴厲批評。Howes（2022）指出，Ingold對感官（the senses）、主體及其棲居樣態（呼吸與行走）的論述帶有過度抽象且普遍化傾向，將人轉化為一種「前文化」（pre-cultural）與「後社會」（post-social）的個體，難以處理感官的社會性、感官經驗的文化中介作用，乃至「大多數感知行動所蘊含的政治性」（Howes 2022: 443）。與現象學取向相對，Howes認為人類學應轉向「以社會為優先」的感性參與（participant sensation），強調眾多感官在文化實踐中被區分、賦予價值、組合或彼此衝突的多樣方式，揭示其「價值判斷過程從來不是中性的，且往往在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展開」（同上引：452），以及「特定文化與環境脈絡中感知主體的嵌置」（Howes 2019: 20）。²

我認為Howes對Ingold的批評是公允的，即後者的「棲居視角」過於強調感官的前反思式統一性（prereflective unity）及可互換性（interchangeability），而且忽略感知主體蘊含的社會、政治與道德意涵（Howes 2022: 453）。然而，若回到具體的田野和民族誌書寫，現象學取徑與感官的文化政治分析並非必然互斥，兩者之間亦存在兼容的可能。例如 Wainwright（2017）在探討烏拉圭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的民族誌中，借助 Ingold（2010）的「天氣世界」存有論與棲居概念呈現「呼吸困難與體外空氣的感知密切交織」（Wainwright 2017: 333）。當地人經驗與詮釋天氣的方式既受身體形質所制約，也受文化框架影響。烏拉圭Montevideo居民的「空氣談話」（air talk）與對「新鮮、健康」／「停滯、混濁」空氣的感觸，皆根植於二十世紀初烏拉圭國族建構、醫療化

2 有關嗅覺、觸覺等感官的文化建構與中介，以及感官經驗如何在日常、儀式與制度等層面滲入社會、政治權力關係，可參見Howes and Classen（2013）；Classen（2005）以及Classen et al.（2002）。

與文明化工程的歷史脈絡，並與當代的都市空間區劃、新自由主義政策及環境污染加劇相互糾纏（同上引：336）。醫護人員在比較醫院與家屋空氣品質時，一方面揭露貧困患者居住於都市環境的脆弱性，另方面則強調空氣的具體質感（寒冷與潮濕）會影響當地人對彼此呼吸與身體狀態的覺察（同上引：337）。至於COPD患者使用霧化器、調整作息姿勢等緩解手段，也使 Montevideo 的濕潤氣候通過呼吸而具身化，形塑出當地人適應多變天氣的治療實踐及照護主體性（同上引：339）。

Choy（2011）講述的「香港空氣多重實質化」故事（the story of air's substantiation in Hong Kong），同樣結合了呼吸的現象學分析與文化政治批判：空氣污染在不同語境下被轉譯為地方性與全球性的風險指標和醫學關注（medical concern），而「空氣」（*hung1 hei3*）在香港日常語言和各區居住實踐中也具有詩意的物質性（poetic mattering）（Choy 2011: 156）。空氣的詩意和觸感（tactility）既體現於呼吸、氣味、風、天氣、空調、建築空間、污染等具身參與（embodied engagements）當中，也在於其滲透性「讓主體與環境、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同上引：156-157）。Choy 進而從階級與環境政治角度，描繪一系列都市中不均衡分布的「空氣口袋」（air pockets），比較中環、旺角、大澳、龍鼓灘等地的空氣品質與風景，揭露空氣「如何在建築之間滯留、隨風流動，並映照出全球政治經濟、後殖民焦慮與健康的交織」（同上引：165）。然而，十多年後的香港，當蔓延全球的大氣警戒不斷迫使空氣顯形、成為「環繞受損生命的死亡政治場域」之際（Choy and Zee 2015: 211），我們更有必要將呼吸者於大氣波動與混融中尋路、感知的具身實踐，連結到抗議政治的討論。正如Choy與Zee（2015）在一篇「懸浮不定的人類學」（an anthropology in suspension）導言中寫道：「探問懸浮的主體，其實就是追問：在逐漸變得濃稠的大氣之中，哪些存在正在生成？」。

呼應以上所述，身體棲居於大氣中的物質性、流動性和多重文化意涵，我主張當「球域棲居」概念被應用於都市維安及抗議政治脈絡時，研究者需進一步關注情動身體於環境中展現的，更為複雜且多層次的運動模式。在此，催淚瓦斯並不止於喚起恐懼、焦慮、絕望等負面的情動強度；其政治效力往往展現為矛盾且含混的情動效應，能向多重向度擴散，被不同身體吸收、過濾與轉

化。在特定情境中，催淚瓦斯可能喚起憤怒與悲憫，激發道德感與行動衝動；對於那些歷經訓練、裝備齊全的抗議者而言，它甚至可能引發冷笑、自嘲、亢奮或淡然無感的回應，或是凝聚集體的抵抗意志，並促發主體性的轉化與政治覺醒。

那麼在抗議現場中，人與大氣暴力的關係究竟為何？身體又是如何感知並介入都市環境的變化與威脅？為了回應這些提問，本文的分析焦點從「負面的球域棲居」轉向「大氣警戒中的運動」本身，特別是抗議者在大氣警戒時空中經歷主體化的過程。催淚瓦斯等大氣暴力形式不僅僅會造成壓迫，更可能催生出社會運動中的生產性（productive）與生成性（generative）政治動能（Leff 2024: 204）。作為理論化「運動」的起點，我從「物質隱喻」（material metaphors）與「具象」（figuration）視角切入，並在後續節次結合香港流水革命的經驗材料，探討在大氣警戒構成的暴力空間中，身體如何以其脆弱性（vulnerability）為起點，展開重新定向與具身運動的實作，進而回應並轉化大氣暴力的多重效應。

透過對「食催淚彈」與「如水抗爭」這兩個物質隱喻的詮釋，我將闡述流水革命中兩種關鍵的「身體—環境」共構模式：「呼吸—情動具身化」（breathing-affective embodiment）與「軀體—物質參與」（somatic-material engagement）。這兩者揭示政治抗議中身體感知與都市環境之間互相塑造的動態關係，也為重新思考社會「運動」與物質性緊密纏繞的分散式集體政治，提供一個反思性的「情動—主體」理論基礎。

二、情動的重新定向：大氣暴力中的具身運動與物質隱喻

在分析大氣暴力如何透過催淚瓦斯與臭鼬水等「武器化呼吸」（weaponising breathing）的技術配置進行警戒時，Joronen（2023a）指出這類情境凸顯出「球域棲居的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sphere-dwelling）及其存有論政治意涵。政府對大氣的否定性干預迫使身體曝露於不穩定的空氣球域之中，揭示了身體與球域之間的「相互脆弱性」（reciprocal vulnerability）。一方面，身體依賴於氣息與環境的持續交換；另方面，球域本身亦表現出無能與

易變，無法穩定容納生命存在。在這種「身體—環境」共構關係中，呼吸顯現為生命無從逃避的界限，使得「呼吸無基底的空氣」（breathing of groundless air）成為人類棲居的負面條件（Joronen 2023a: 767）。所謂「無基底」，指的是空氣在本體上作為無依憑的存在媒介，即身體無法不呼吸，因而曝露於無法選擇的脆弱性之中：

這種無法解決的，對空氣的脆弱性，揭示了內在於球域棲居的否定性。身體與空氣相互依存，不能簡單框構為關係性的拼裝（a relational assemblage）……相反，球域棲居指向一種球域論的脆弱性（a sphereological vulnerability），而這種脆弱性，根本上受限於身體無法克服自身對呼吸的依賴。（同上引：776）

大氣警戒作為奪取呼吸的否定性存有關係，亦可與女性主義思想家Sara Ahmed（2006）提出的「我所不能的空間」（space of I cannot）概念相對照。身體在其中失去慣常定向及行動力，「無法以特定的意向方式向對象延展」（Ahmed 2006: 49）。Joronen進一步指出，空氣並非穩定之物，而是一種「脆弱的發生」（vulnerable happening），它通過無基底的開放狀態，持續容納和釋放波動、輻射、懸浮乃至振動的物質性（Joronen 2023a: 777）。正因空氣具有生成性，它成為不穩定的存在條件，牽動身體與球域之間的不斷交織與互涉。

在理論化球域棲居的負面條件時，Joronen引入「身體的不可還原性」（the irreducibility of the body）與「球域的無能」（the incapacity of the spheric）兩項概念，意圖突破將棲居者簡化為純粹「受害者」或「創傷承受者」的侷限。此舉無疑拓展了大氣暴力的哲學思考，涵納更複雜的存有向度。然而，Joronen採取負面地理學（negative geographies）取徑，聚焦於呼吸者「無法突破的界限」（同上引：776），使他對巴勒斯坦案例的描繪仍深受「裸命」（bare life）邏輯所限：面對催淚瓦斯與臭鼬水等警戒武器，身體僅被呈現為受創與曝露的場所，缺乏對反抗實作或主體再生的具體想像。

若把焦點轉向實際的都市抗爭場域，我們將看到另一種可能性浮現。在大氣警戒所構成的否定性環境中，身體雖在初始受到干擾與阻斷，卻沒有因此完

全失能。恰恰相反，在受限與擠壓的條件下，抗議者通過重新調整身體感知、與周遭環境及對象的交涉方式，在物質和技術中介下生成多樣化的集體實作。借用Ahmed（2006）提出的酷兒現象學視角，我主張香港抗議者的抵抗經驗可被理解為「在惑亂中重新定向」的過程：一方面，他們在大氣暴力的否定性環境中駐留，處理身體所承受的焦慮與壓迫；另一方面，他們透過創發性的物質與空間實作，回應並轉化這些宰制力量。這樣的定向固然是對身體感知結構的重新部署，卻也生成了新的政治主體。換言之，儘管Joronen（2023a）對於「呼吸無基底的空氣」的強調，有助凸顯呼吸不可避免的具身限制，但他並未充分處理「氣息」作為情動政治媒介所具有的在地性向度（local orientation）。呼吸除了涉及生理層面的物質性交換，亦嵌入於語言、記憶與情感的歷史脈絡。如同Ahmed（2006）指出，定向包含身體的意向性、趨向與慣習之轉化歷程。這也是香港抗議者在大氣暴力中實踐「反向呼吸」，在毒氣中生成倫理關係與開拓政治空間的關鍵所在。

換言之，我們需要深入探討身體在大氣中的沉浸（immersion）與情動遭遇（affective encounters），如何牽動主體性與意義的動態重構。人類學者Henrietta Moore（2011）認為，情動、語言、人類能動性與主體性始終彼此交織。即使情動難以被語言完全捕捉，它也不可能全然脫離意指系統而存在。語言之所以與情動不可分割，「在於符號具有物質性與非任意性，使語言與世界無法被截然劃分為兩端；畢竟，語言作為言說／書寫，本身就是能夠生成情動的日常具身實踐」（Moore 2011: 185）。Ahmed（2004）也指出，情動透過語言傳達，更藉由語言設定身體與對象的關係，參與塑造世界的「表面」（surface）和「感覺路向」（feel the way）。舉例來說，當我們使用「哀悼」一詞時，它可能與某些主體或對象產生聯繫，也可能與其他情感詞彙，如憤怒、仇恨、愛等共構為敘事性的語境（Ahmed 2004: 13）。情動的運作方式不限於語言層面，也與生命活動相連。話語的情動效力，正是透過符號在身體上的「黏附」（stickiness）產生具體影響。例如當他者被標籤為「可憎的」，這一命名的指涉效應（referential effects）便可能形塑出相應的行動和定向（orientation）（同上引：14）。因此語言作為具身、物質性的實作場所，成為情動得以轉化、聚合及擴散的樞紐。情動之所以具有政治與倫理意涵，在

於它使身體傾向於某些對象，同時避離其他對象；這種傾向並非內在或自然形成，而是在情動的價值積累過程中逐漸顯露。情動的實作「創造了邊界與表面，使我們能夠首先區分出什麼是『內』、什麼是『外』；情感的對象就在這種流通與接觸中形成輪廓與形狀」（同上引：10）。換言之，情動的政治動能正以構成性（constitutive）的方式形塑主體與世界的關係。

將Ahmed的定向理論結合香港抗議者對「氣化」的本地詞彙表達，有助釐清特定物質隱喻如何成為身體感知和理解情境的媒介，在大氣警戒中參與情動主體的轉化。以「流水革命」的命名為例，這一隱喻召喚出如水般柔韌、流動、避實擊虛的戰術策略，涉及兩個層次的重新定向：其一是對身體與物質共構及其意義轉化；其二是都市遊走模式及地理知識的動態生成。在這些情境性的實作關係中，抗議者並非被動承受化學暴力的「擠壓」，而是透過具象的物質隱喻和具身運動，參與集體環境感知與政治重構的主體。因此本文從「無基底空氣」（groundless air）轉向「接地氣」（down-to-earth）的物質隱喻，追蹤了香港抗議者對催淚瓦斯的語言表述，如何反向地呼吸根植於臟器感覺的氣息。流水革命期間，諸如「食催淚彈」（*sik6 ceoi1 lei6 daan2*）等本土語言的廣泛流傳，正是「運動」將國家化學暴力內攝為記憶與文化編碼的具身實作。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粵語的「食」（*sik6*）³具有多層意涵，涵蓋進食、抽吸、忍受苦痛和傷害（如「食煙」*sik6 jin1*、「食拳頭」*sik6 kyun4 tau4*、「食波餅」*sik6 bo1 beng2*），也延伸到語言與思維層面（如「食字」*sik6 zi6*、「食腦」*sik6 nou5*）。2019年以來，「食過催淚彈」（*sik6 gwo3 ceoi1 lei6 daan2*）、「催淚彈放題」（*ceoi1 lei6 daan2 fong3 tai4*）、「十八區街坊仲有邊度未食過彈？」（*sap6 baat3 keoi1 gaai1 fong1 zung6 jau5 bin1 dou6 mei6 sik6 gwo3 daan2*）等俗語，除了展現香港人以幽默、諷刺等態度回應危機，亦把毒氣侵入身體的恐懼與受害經驗，重構為可共享、承載政治訴求的集體環境感知。這類語言在網絡、街頭與社區中廣泛流通，讓「呼吸」與「吞食」從抽象的哲學思辨轉化為民眾能具體定位跨尺度暴力與社會認同的啟發式裝置（heuristic device）。

3 有關香港本地詞彙之粵語拼音及聲調，我使用了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製作的《粵語審音配詞字庫》。網址：<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

像食彈這樣的本地詞彙能給予抗議政治研究什麼啟發？實際上，替代性的經驗結構往往可以啟發新的理論範式。Mol (2021) 認為，抽象的理論術語過度穩固，將導致思維僵化，扼殺哲學的創造力 (Mol 2021: 16)。相反，哲學的生命力來自術語的可變性與情境適應性，例如法國哲學家 Michel Serres「曾提出一系列描繪流動的替代模型作為思考工具，例如：水與土地交融的泥濘、反覆形成與消散的雲霧、蜿蜒曲折的小徑，以及灼燒所遇萬物的火焰」(同上引：20)。Serres (2018) 在《物理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Physics*) 中，倡議哲學應從「固態」(solidity) 邏輯轉向「流體」(fluidity) 思維，從靜態形式過渡至自然力動的理解，並以漩渦 (vortex)、河流等物理現象為模型，把握創意的非線性、湍流、混沌等動態。

呼應這樣的流動思維，香港流水革命中的“Be Water”格言，經常被抗議者與評論者援引：「要無形，無影，像水一樣，水可以流動，也可以衝擊；成為水吧，我的朋友」(Anderlini 2019)。儘管水的隱喻已廣泛應用於社會運動的修辭與分析，構成一個重要的政治語言場域，但我主張水更與身體的生命活動緊密纏繞。這樣的理解趨同於Neimanis (2013) 提出的「具身具象」(embodied figuration) 概念，與Serres的觀點相近，均挑戰了傳統上將隱喻與語言單純視為表徵的觀點。具象是植根於物質經驗的主體生成過程，「具象的吸引力，恰恰在於它們強而有力地激發出具想像力的政治空間，拒絕被僅僅視為隱喻。每一個具象都充滿張力與危險，深植於真實生活的勞動」(Neimanis 2013: 26)。在此意義上，具象表徵經驗，同時參與經驗生成。水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構成肉身存有的一部分，浸潤我們的呼吸、排泄、哭泣與流動。若僅將水視為修辭或象徵，便容易忽略它作為生命條件與感知媒介的複數意義，以及背後潛藏的認識論與倫理—政治意涵(同上引：35)。

綜合前述有關呼吸脆弱性、情動定向及物質隱喻的討論，我主張當代社會運動的理論化，必須回到身體處於大氣暴力中的沉浸與遊走經驗，才能生成更敏感於流動、滲透與湍流等動態關係的思維方式。在本文以下部分，我以香港抗議者實踐的食催淚彈，如水抗爭 (*sik6 ceoi1 lei6 daan2, jyu4 seoi2 kong3 zaang1*) 為概念場景，探討他們如何在大氣警戒的負面球域棲居條件下，展露出情動主體化 (affective subjectification) 的動態。換言之，我們需要重構「運

動」(movement)在抗議政治中的語義，它不應僅被理解為物理移置或社會動員的描述性語彙，而是充盈著生機(animate)和氣息的概念：亦即「運動」包含「呼吸—情動具身化」與「軀體—物質參與」的雙重主體轉化過程。這種理解不將主體性視為僵固且抽離於情境脈絡的自明預設，而是在空氣中（可能是非自主）的展露、感知與回應中反覆生成。這一觀點亦呼應哲學家 Judith Butler (2016) 提出的關鍵問題，亦即脆弱性如何成為抵抗的起點，讓我們重新想像那些被暴力擠壓，卻能創造性地回應社會物質環境的身體？

進入分析之前，先簡要說明香港個案的經驗方法設計。資料蒐集始於我在香港流水革命期間實際走訪多個抗議現場，以及此後廣泛蒐集次級資料，包括新聞報導、照片、影片紀錄、宣傳資料、網路地圖與社交媒體對話等。同時也納入口述歷史文本，如《中信圍困日記》（中信圍困團隊 2020）與《香港祕密行動》（楊威利修 2023）。這些資料忠實記錄了抗議者與市民的參與經驗、身分轉變、抗爭實踐、物資的使用狀況、遭遇催淚瓦斯的經驗等等。在次級資料之外，我透過滾雪球抽樣法招募了17位受訪者（本文第四節內容主要涵蓋其中4位）。受訪者招募方式來自我於香港及台灣的人際網絡，以及通過社交媒體與加密通訊軟體聯繫。這種方式可能在樣本多樣性上有所限制，卻有助於建立信任基礎，促進開放而深入的訪談。受訪者年齡主要介於20至30歲之間，參與角色涵蓋和平抗議者、前線行動者與學生組織者等，其身分認同亦可能隨運動進程而轉變。訪談內容著重於受訪者對抗議現場的感知與解讀，包括如何理解都市環境與氛圍的變化、如何獲取、製作與應用抗爭物資，以及其在不同行動情境中的身體感受與情緒反應。訪談主要以粵語進行，並在訪談後逐字轉錄為中文。為保障受訪者的隱私與安全，所有可識別資訊皆經過匿名處理，或以化名或代碼標示。

三、食催淚彈：大氣警戒中的呼吸—情動具身化

催淚瓦斯作為大氣警戒武器，其中含有的「鄰—氯苯亞甲基丙二腈」(2-Chlorobenzalmalonitrile, 也常被稱為「CS gas」) 是一種化學刺激物，吸入後會與體內的黏膜和皮膚感覺神經受體作用，導致多重、迅速的臨床反

應。根據接觸時間長短、距離遠近、所在空間的開放程度等「球域條件」，以及個體的生理差異（如健康狀況或敏感體質），催淚瓦斯可能引發劇烈的痛覺、腺體的非自主反應、暫時視力喪失、肌肉反射性抽動和呼吸困難（Brown et al. 2021: 209）。其他常見的身體反應也包括眼睛流淚和灼燒感、咳嗽、皮膚搔癢、皮疹、水泡、高血壓、噁心、嘔吐和煩躁不安；在極端情況下，更可能引發永久性殘疾，例如失明、創傷性腦損傷、慢性皮膚病等後遺症（Chan et al. 2019: 1517）。這些化學反應在不同程度上干擾人類（和其他生物）的身體機能，將目標置於由痛感與缺氧組構的暴力氛圍中，足以打斷抗議者原有的呼吸節奏與空間感，迫使身體陷入情動失向（affective disorientation）的狀態。

然而，這種情動失向的經驗也是抗議者重新定向的轉折點。在綿延的痛感與窒息中，當催淚彈（催淚瓦斯）成為可以食的對象時，語言與物質便不再分屬表徵與實體的兩極，而是交織為一種獨特的身體記憶與環境感知形式，構成香港抗議者在政治風暴中「把握路向」（feel the way）的知覺感受。在香港的語境中，催淚瓦斯帶來的感官與身體衝擊，被抗議者轉譯為一套具有強烈在地語感的詞彙。食彈、催淚彈放題、邊區街坊未食過催淚彈？等語句，體現抗議者對警察大氣暴力的反諷與幽默回應，以及他們對化學暴力的內攝與轉譯。當抗議者說食過彈時，他們不只是被動吸入毒氣的受害者，而是透過「進食」這一具象，具身地感知和註記（register）當時的社會物質環境，參與對暴力經驗的處理和意義重構。這種理解有賴於Mol（2021）對進食的重新詮釋。⁴他指出，「正在進食的人」既不是抽象的普遍主體，也不是社會學中某種類型化的分類範疇，其肉身存有始終在特定情境和條件下，與社會物質環境密切交纏（intertwine）。進食是由感官經驗、物質實作和語言操演所構成的複合場域，其中交織著關於「存在」（being）、「知曉」（knowing）、「作為」

4 Mol（2021）在*Eating in Theory*各章對「進食」作為身體存有模式的層次區分，有助於本文構框香港抗議者與催淚瓦斯纏繞而成的環境感知。其一，“eating as being”可對應食彈中抗議者在窒息與逃逸之際，透過對毒氣的呼吸、耐受與消化，經歷各種政治性的質變歷程；其二，“eating as knowing”涵蓋食彈所牽引並在現場浮現的差異化感知與評價（關於自我、警方與其他抗議者的感受和判斷）；其三，“eating as doing”則指向由食彈情境所湧現、分佈於時空中的任務（task）與倫理關係：抗議者在臨時聚合的線上／線下集群中，持續與其他身體和環境協商，在難以預料的大氣／氛圍波動中進行實作應對（也銜接到第四節對如水抗爭的討論）。

(doing) 與「關係」(relating) 的多重模式。它提供了與行走(walking) 截然不同的存在範式，進食者並非在外部世界中主動移動的封閉個體，而是透過半滲透性的身體界線與世界互動，展現出不斷流變，內外互滲的狀態：「當我是行走者時，我在世界中移動；而當我進食時，則是世界在我體內移動」(Mol 2021: 49)。

在2019-2020年的香港，催淚瓦斯以高度可見、廣泛散播與反覆出現的形式，成為都市景觀無法忽視的一部分，持續佔據公眾與媒體的視線(和嗅覺、聽覺)焦點。根據香港警方資料，從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30日，警方在全港多區釋放了超過16,223枚催淚彈(端傳媒，2020-07-27)，遠超全球其他城市的使用規模，且大幅超越2014年雨傘運動金鐘現場釋放87枚的紀錄。這段期間，催淚瓦斯滲透全城，從主要幹道到住宅小巷無所不在，彈殼堆積，氣味瀰漫。甚至許多民居亦未能倖免，煙霧入侵家屋空間，縈繞不去，成為居民日常感官經驗的一部分，許多人更在夜間夢中反覆重現這段窒息與混亂的經歷。

從國家治理視角來看，催淚瓦斯在都市空間中反覆、密集地釋放，是一種調節群體行為、塑造都市氛圍的治理技術。Furuhata (2022) 指出，催淚瓦斯與都市監控網絡的電子訊號共同構成「氣候媒體」(climatic media)，賦予國家在危機中重整大氣環境與社會秩序的技術能力。這種化學氣霧猶如一套隱微卻有效的空調機制，能改變地方大氣(local atmospheres)的化學組成，進而施行社會調節(social conditioning) (Furuhata 2022: 133)。在衝突情境中，這類大氣暴力是具有沉浸性與交流性(communicative)的政治媒介。當警方用催淚瓦斯瞄準抗議者的呼吸系統發動攻擊時，實際上也在發出訊號，企圖瓦解目標群眾的意志與凝聚力。這種「廣播」可類比於戰爭中的空軍轟炸，其目的不只是摧毀物理空間，更在於傳遞「投降」訊息(同上引：136)。香港警方細緻地部署大氣警戒，防暴警察(在程序上會先)舉起黑旗，配合擴音器發出警告，如：「示威者勿衝擊防線及即時散去，如示威者使用武力，警方將會發射催淚彈驅散及拘捕」(香港 01, 2020-07-01)。這種可視化的威嚇預期民眾在見旗後立刻撤退，否則將面臨暴力清場及拘捕。不過，當催淚瓦斯實際釋放，其作用便超越了「警告」的溝通目的。化學煙霧所構成的大氣暴力，直接干擾抗議者的身體節律和感官知覺，除了激發群眾的負面情動，也重塑了他們

的移動性與社會位置。身體與毒氣交纏，不得不活動起來。此外，催淚瓦斯也可能（意外地）使得抗爭動能流動與擴散，溢出警察和抗議者原有的想像。

以下的食催淚彈小節，將重構流水革命抗議者在具體事件和場域中，與催淚瓦斯的情動遭遇和後續效應。我的闡述沿著多個層次展開：從抗議者最初遭遇（first encounter）所引發的未知感與衝擊開始，經歷失向狀態，進而浮現倫理想像、主體位置的轉化，以及在現場開展的臨時協作與照護行動。這些轉變與其說預設了「主體具備自主意志及理性策略」的線性歷程，不如說是抗議者反覆遭遇大氣警戒，通過身體與物質親密的纏繞，逐漸浮現出動態、開放的具身化過程。

（一）最初的情動遭遇與催淚的滋味

你說你不想遠離／煙霧的滋味／已看不到距離
勝利的日期／朦朧的希冀／時代的奧秘
你看到煙已霧起／靈魂已準備／誰願有這勇氣
與肉體分離／無謂的黑旗／窒息的空氣

—My Little Airport (2019a) 《煙》

在流水革命的612事件中，數萬名抗議者包圍金鐘立法會，試圖阻止《逃犯條例》修訂案進入二讀程序。當天下午，警方在未有充分預警的情況下武力清場，將催淚彈射入原本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的和平集會場地。多枚催淚彈自槍口噴出，白色毒霧迅速瀰漫於群眾之間，隨之而來的是窒息的恐懼與圍困感。對於身處現場的眾多抗議者而言，催淚瓦斯除了衝擊呼吸系統，亦會激發其他感官失衡與心理震撼，構成危險的「情動—生理回饋循環」（affective-physiological feedback loop）。

警戒與鎮壓並不總是以身體直接碰撞為條件。事實上，許多位於後排、無法直接目睹警察行動的「和理非」（*wo4 lei5 fei2*）抗議者，都在毫無預警中被捲入令人窒息的暴力。根據一位參與者的描述：

直到三時多，望向立法會方向，知道戰友有所行動，前面有人叫我們向演藝[大學]方向退後，但由於警察就站在分域碼頭街，我們其實也不能退得太後。我們一直看著立法會那一邊，但其實什麼都看不見，只是一直傳來一些需要物資的消息……過了一會，開始聽到前面有發放催淚彈的聲音，然後望到「煲底」[金鐘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示威區]的白煙，繼而是看見一枚一枚催淚彈在添美道的上空飛過。突然間，有發射催淚彈的聲音從我們後方傳來！根本沒有人會預料有這一著。（中信圍困團隊 2020: 43）

催淚瓦斯突如其來的震撼，構成一種深刻的「未知感」，進而引發抗議者的失向。身體尚未能辨識敵意從何而來，已被嗆得不能呼吸和睜開眼睛。

抗議者「和牛」（化名）在首次吸入催淚瓦斯時，立刻經歷到劇烈的感官失能和傷害：「雙眼酸澀得不能睜開。閉氣仍覺得非常刺鼻。轉用口呼吸，喉嚨又好似被灼傷的感覺。用回鼻又呼吸不到，令人極度惶恐」（同上引：77）。與此同時，催淚瓦斯與城市現場的地形條件產生耦合效應，構成密閉、難以逃離的毒霧領域。例如，抗議者「微塵」（化名）回憶他在中信大廈附近被前後夾擊的經驗：

前面添美道仍然不斷有戰友逃生，後面的警方又開始向我們推進和發射催淚彈，那時候我們根本是被前後夾攻！走進中信大廈就是唯一一個可以離開的方法！但由於本來站在龍匯道的人數眾多，而且中信大廈只有一邊門有開啟讓我們進去，同時警方不停向我們這邊擲了很多枚催淚彈，我們只能夠用濕毛巾盡量蓋住口鼻，在眼睛半張開的情況之下，扶著身邊的戰友摸路，希望能進入中信大廈。我們已設法離開，但還是看見幾枚催淚彈正落在我們中間，令一帶空氣都有濃濃的氣味。可是，由於根本無路可走，很擠逼又沒有位置可以移動，在外未能進入中信大廈的我們都只能夠「硬食」催淚彈，附近所有人都感到不適，所有人都很無助，我們只能哭泣。（同上引：43-44）

此處所謂的「硬食」（ngaang6 sik6），凸顯了抗議者在無法選擇的情境中，被迫吸入毒氣，同時也體現出原有環境感知的崩解與失向的負面情動急遽加深。

在缺乏風勢吹散和氣流稀釋的情況下，毒煙於密閉或半封閉的空間中迅速累積，壓迫了抗議者能夠正常呼吸的空間，也持續干擾人的感官、移動與判斷能力。另一位進入中信大廈的抗議者「明日香」（化名）描述了他在化學氣霧中掙扎求生的經驗：

突然，催淚瓦斯射向[民陣]大台，就在我跟丈夫不遠的位置。那時空氣充滿化學物，根本無法呼吸，我好害怕，怕發生人踩人。自己對聲音、氣味、能量很敏感，周遭充滿恐懼：發射催淚彈的聲音、人們呼喊的聲音、大力敲打玻璃的聲音，還有化學的氣味……進入了中信大廈內，沒有很安全，因為整棟大廈都充斥著催淚煙霧，我們不斷往上走，嘗試看看空氣有沒有好點——是沒有的！呼吸越來越困難，而且很痛。看著周邊的人，大家的痛苦、無助的表情，深深印了在自己的腦海裡，我跟丈夫一直走來走去，嘗試尋找出口。

隔天，6月13日，發燒。6月16日，全身出風疹。中信大廈一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陰影。到人多的地方，當自己被人群包圍時，會害怕有催淚彈出現；於人多的商場或室內時，會怕被困：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在封閉的空間內，如浴室，也出現恐懼感，隨之崩潰。直到現在……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好起來。（同上引：72-74）

這顯示，大氣警戒的暴力效應不僅發生於抗爭現場的「此時此地」，更具有時空延展性，將身體置於情動失向與受困的狀態，成為黏附於抗議者記憶、情緒與生理反應的傷痕。在這些情境中，食彈的存在模式意味著抗議者正經歷「質變」（transubstantiation）：「我的形態可能保持不變，但我的物質組成卻在不斷變化……新陳代謝的身體：在此與彼之間，是多重場域的、分散的存在」（Mol 2021: 30）。

(二) 從食彈到抗爭的情動重新定向

去到現場 有人叫佢唔好行咁前／然後 佢第一次親眼見到催淚彈
 佢跟住大家 向後退 開遮 踎低 向後退 來來回回
 幾粒催淚彈之後／佢有種從未試過嘅感覺
 時間突然好慢 周圍好靜／佢覺得呢個瞬間
 最前線嘅人係自己／後面用士巴拿拆緊鐵欄嘅人又係自己
 旁邊鬧緊街坊唔好影相嘅人又係自己／遠處坐緊監嘅人又係自己⁵

—My Little Airport (2019b) 《吳小姐》

在街頭抗爭現場，抗議者食彈的經驗並非如實驗室情境預設的線性對應關係：刺激作為輸入（input），會產出單一、穩定的訊號反饋。相反，毒氣的感官數據（sense data）在不同身體中會激發差異化的情動回應。對部分抗議者而言，催淚瓦斯可能激起憤怒和反抗；而對其他人則可能引發不安、惶恐乃至癱瘓。特別是當催淚瓦斯成為香港的「生活日常」，它所激起的感受也是分化的，抗議者的知覺甚至可能因重複接觸而變得冷靜或麻木，就如 Mol (2021: 58) 所言：「當進食被擺到背景中，被其他活動奪去注意力時，食物的感官特徵往往無法被察覺」。在身陷催淚瓦斯的情境中，知覺本身並不自然發生，而是「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事件，是可能主動進行，也可能被忽略的行動」（同上引）。而且身體專注於品味，對世界的知覺與對自身的感受可同步進行，認知既向外擴張也能向內摺疊，展現出感知與作為交纏的動態性。

5 中文書面語的翻譯如下：

到了現場 有人勸他不要走得那麼前／然後 他第一次親眼目睹催淚彈
 他跟著大家 向後退 撐起雨傘 蹲下 向後退 來來回回
 幾顆催淚彈之後／他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
 時間突然變得很慢 四周一片寂靜／他覺得在那一瞬間
 站在最前線的人是自己／在後方用扳手拆卸鐵欄的人也是自己
 在旁邊責罵街坊不要拍照的人也是自己／遠方正在服刑坐牢的人也是自己

催淚瓦斯作為國家化學暴力滲入抗爭現場，它帶來的皮膚刺痛、呼吸受阻與心理震攝，不僅是為了驅散群眾，更意圖剝奪其身體駐留與抗議發聲的能量，重奪被政府視為「非法佔領」的空間（de Larrinaga 2016: 537）。作為一種隨風流動的化學氣體，催淚瓦斯情動地「捕食」並「黏附」於抗議者的身體，催逼其移動與逃離。甚至有一名抗議者描述：

催淚彈的氣味簡直就像有生命般，追著我們跑！後面不斷有人叫大家繼續走……而催淚彈的氣味繼續尾隨我們，有人咳嗽、乾吐、洗眼睛，就只有一件事大家沒做過，就是反抗！我們都是戰場上的難民，毫無反抗之力，只能拼命逃跑。（中信圍困團隊 2020: 111）

大氣警戒透過改變都市移動場域的化學組成，引導人群分散，為防暴警察的抓捕小隊（snatch teams）創造行動空間；至於逃離現場的人群則被迫尋找可以「喘息」的存活縫隙，但在此處，被毒霧推開的移動身體不僅是他者化的裸命，也可能會促成主體性從受苦走向反抗的轉向。

612事件當天，抗議者「棉花糖」（化名）反覆參與現場的協作及分工任務，親歷警方突襲施放催淚瓦斯的混亂場景後，逐步生成對執法者的不信任感。「棉花糖」當時猶如進入了一座新的城市，在與其他一起遊走的抗議者持續互動中，他漸漸喚起了「身在戰場的覺醒」。這種激烈的情緒與覺知並非源自認知者的單向決定，而是在身體與物質交纏、擠壓和碰觸的張力之中，主體意向性及定向得以重新塑造與調整。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境：

一路上看到警方重重佈防，警車數目不尋常的多，大隊警察也已手持盾牌列陣，甚至有速龍小隊到場。抵達龍匯道中信大廈外，再望向「煲底」方向，穿著簡單裝備的前線少年們正面臨警力的包圍，幾道戰線已成形。那一刻我開始進入戒備模式，因為我感覺到這裡是個戰場。（同上引：130）

這種空間感知的轉換讓他進入備戰狀態，也開啟了他身處抗爭場域的倫理想像與具身參與。「棉花糖」與同伴繞行至夏慤道幫忙後勤工作，透過跨身體的協作與物資傳遞的鏈結，成為流動抗爭網絡中的一環：

我們決定繞到夏慤道作後方支援，在人群中不停聽到「煲底」方向傳來要求各種物資的呼叫聲，於是立即幫忙大叫或用手勢，將要求傳送至後面的物資站。「保鮮紙！口罩！索帶！長遮！」長遮很快就沒有了，聽到有人高聲呼叫需要生理鹽水甚至哮喘藥，雖然沒親眼看到前線的慘烈，但我不能停止想像，孩子們正受到怎樣的挨打受苦「食」催淚彈。（同上引：130-131）

流水革命中的食彈作為同時具有生理與倫理維度的經驗，不僅關乎身體對毒氣的感官反應，更牽引出抗議者對他人苦難的想像和連帶感。食彈因此從個體的受苦經驗，擴展為觸發集體共情和行動的情動轉換點。甚至連原本僅在天橋上旁觀的市民，也被現場氛圍所感染，自發拋下手中的雨傘支援前線，這一舉動令「棉花糖」深受感動，強烈地感覺到「始終大家都是香港人」（同上引：131）。此後，他更親身感受到防暴警察施行暴力的無差別性與不可預測性：

一個滿身大汗聲音嘶啞的少年走過來大叫：「大家要守住個『屎忽』（後方的邊緣）！」我們除了不斷點頭和應，也不知下一步應該如何是好……大概8時左右，只是站著偶然叫口號的我們，驚見警隊向我們推進並將黑旗展示一秒，然後我「食了」人生第一枚催淚彈。轉身逃跑之際驚恐交集——原來我什麼也沒有做你也要趕絕我。（同上引）

這一瞬間成為抗議主體性轉變的臨界點：他從原本的參與和支援者位置，在親身遭遇暴力、實質上「食了彈」之後，明確劃出一道針對香港警察的不信任界線：「從此以後我對警隊的信任已蕩然無存，內心一直躁動至今」（同上引）。以上的敘述顯示，香港抗議者在大氣警戒所引發的恐懼、失向、惑亂與身體失能之中，仍然通過具身的參與和評價、跨越身體的情動連帶，流動地

生成新的定向和政治想像；這些投身於「運動」的身體，已難以回歸過往「常態」的感知與存在方式。

（三）從非自主呼吸中湧現的集體臨機應變

催淚瓦斯雖被設計為驅散群眾的大氣控制技術，但在某些情境中，反而會生成抗議集群的凝聚與即興應變的空間。經驗豐富的抗議者往往能發揮自身技能與敏銳感官，在現場影響、引導他人行動，且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學會調適於地方大氣／氛圍，生成臨時的團結形式。即便許多固定醫療站已被催淚煙霧淹沒或遭警方攻破，抗議者依然會在街頭流動地應對，建立除氣基礎設施（de-gassing infrastructure），傳遞防護物資，形成彈性、即時的行動網絡（Leff 2021: 3-4）。例如，社工「漆男」（化名）見證了這種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能力⁶的力量：「[中信]大廈中有許多人需要清洗眼睛，相信大廈內所有人都很擔憂，不知警察會再有什麼行動，但大家很快便團結起來，建立物資站，把哮喘藥拋上二樓，照顧身旁的每一位香港人」（中信圍困團隊 2020: 88）。

換言之，大氣暴力的非自主呼吸不只觸發恐慌與逃逸，也促成倫理關係的重構，召喚出新的照護主體性。除了醫療專業者自願擔任急救員，缺乏專業知識的抗議者亦即興地參與現地照護實踐，發展出一些身體間的相互支撐與作為。抗議者「塵先生」（化名）回憶他在中信大廈中一段急救經驗，展現了催淚瓦斯造成的身體傷害，如何牽動集體臨機應變的照護與抵抗力量的萌發。當時，他與其他抗議者被毒氣包圍，急忙將一名情況惡化的少年抬入店鋪進行護理：

我發現我身後有幾個人正在圍著一個男人，為他急救。我上前行，原來是剛才在救護站看到的那個少年，但看來狀況沒比剛才好，所以別人把他抬了進來繼續護理。有人叫其他人別圍著他，讓他能呼吸更

6 「臨機應變」（improvisation）可理解為處境式的即興實作過程。為了便於在社會運動理論的層面上進行討論，我跟隨社會學者何明修（Ho 2018, 2025）提出的語彙，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翻譯為「集體臨機應變」，並且在本文第五節進一步闡述我的概念化過程與何氏的差異。

多新鮮空氣。可是，原來大家圍著他，是因為他連下體重要的部位也中了催淚彈，準備要脫掉褲子清理，為免尷尬和不雅，才築起人牆來保護他。（同上引：50）

此時，整個店鋪陷入緊張而靜默的氛圍：

在等待救護車到來的期間，店鋪裡的人安靜了下來，每個人都不敢鬆懈，帶著口罩，每個人都露出了絕望、悲傷和略帶疲憊的眼神。過了不久，突然有一排防暴警察從行人天橋衝進了中信大廈，先是喝令一批留在大家樂店鋪門外的抗議者從行人天橋往統一中心方向散去，再企圖強行進入大家樂。店鋪裡的人都顯得非常驚恐，每個人都站了起來，把店鋪的玻璃門頂住，高舉雙手齊聲向門外的防暴警察大叫：「畜牲！畜牲！畜牲！」最後，防暴警察不知為何，真的沒衝進來，很快便撤退了。可是，站在玻璃大門前的眾人，一直都不敢坐下，繼續把大門守住，直到救護員到來，我們才敢把玻璃大門打開。（同上引：52）

這段經歷顯示，即使身處毒氣與圍困交織的驚恐中，抗議者依然奮力站穩腳跟，守護彼此。為了保護少年免於羞辱，他們即興地築起人牆；為了抵禦警方攻堅，他們齊聲吶喊並用身體支撐門扉。在這個緊繃和敵意密布的情動空間中，對於呼吸脆弱性的照護行動本身即是反抗，一種以肉身和倫理判斷回應暴力的政治實踐。這種集體臨機應變的作為，既在當刻緩和了國家化學暴力，更成為抗議者主體性生成及抵抗倫理開展的契機。

正如Ahmed（2006）提出，定向指的是具有方向性的感知結構，存在者藉由以身體「朝向」特定方向（direction），開展世界，並在定向中行動和遭遇對象。這些方向不僅意味著移動軌跡，也蘊含了「指引性」與「社會承諾」，塑造我們跟隨某些線（lines）行進的習慣與慾望。這些線條指導身體穿越空間的方式，形成表面與邊界，並在歷史與制度的重複中維持其正當性。然而，這些「方向」亦可能因異常事件或危機場景（如催淚瓦斯衝擊）而產生失向、脫軌與偏移的可能性（Ahmed 2006: 11）。香港抗議者在流水革命中食彈，面對

大氣暴力的特殊意向性不會自然發生，身體在反覆遭遇與接觸對象的過程中，才逐步形塑出情動定向。這些定向標記某些對象的可接近性與遭遇方式，也反向規定了哪些對象將被排除、拒斥與遠離。當對象因反覆的遭遇、接觸而變得黏著，便在社會場域中流通與傳遞，累積特定的情動價值與道德評價（Ahmed 2010: 41）。在香港，催淚瓦斯的黏性凝結了抗議經驗的歷史厚度，且在日常反覆實踐中產生了一套慣習，持續塑造個體與社會、身體與世界之間的表面及其肌理。食彈的重新定向具體展現為身體在與催淚瓦斯的化學、氣味、感官與表徵層次的多重接觸中，生成對警方鎮壓的多種情動回應和主體位置。

這種身體與世界的互為塑造，在香港抗議者與催淚瓦斯的遭遇和呼吸情境中尤其鮮明。如Mol（2021）對進食知覺的分析指出，「知曉」來自多重感官輸入的整合結果，亦關乎身體敏感性的當下作用，即個體在特定時刻，聚焦於所攝取的物質引發的身體反應，進而形成具體且不完全可以預測的知覺感知（Mol 2021: 61）。這個過程總是與身體狀態、物質接觸與情境動態緊密交織。若說步行曾被視為現代都市棲居的典範情境，那麼在香港的流水革命中，這一典範也就與街頭食彈密不可分。身處催淚毒氣瀰漫與警方驅趕之間的危機時刻，抗議主體同時作為步行者、呼吸者、進食者與抵抗者等多重位置的交織存在。他們通過呼吸、情動轉化與臨機應變，在特定社會物質條件中進行干預和實作。若我們透過進食的場景重新想像人的存在，他將從封閉穩定的自我，轉變為一種「半滲透性的身體與拓撲複雜世界之間所展開的轉化性交會」（a transformative engagement of semipermeable bodies with a topologically intricate world）（同上引：30）。

香港警方施放的催淚瓦斯觸發了現場群眾之間自發的判斷、調適和交流。為應對突如其來的毒氣及防暴警察逼迫，抗議者形成暫時聚合的「呼吸同謀」（conspiracy），展開即興照護實踐並協同逃生。這些由大氣湍流促成的身體脆弱性及鄰近性，不止於一時的互助行為，更塑造了他們日後在警戒大氣／氛圍中的定向和倫理關係。在衝突密布的都市環境中，為了確保自身與其他「手足」（sau2 zuk1）的移動性與抗議動能，有經驗的抗議者學習到如何運用身體實作與游擊策略駕馭催淚瓦斯的影響。他們漸漸適應有毒環境，更積極地反向干預，使原本的警戒大氣轉變為群眾集結、照護與逆反的抗議氛圍。換言之，

在大氣暴力的失序當中，「運動」生成了替代性的社會秩序與倫理世界。在以下節次，我將通過如水抗爭這一物質隱喻，深入分析這些隨「運動」展開而發展的抗議物質性（protest materialities）和軀體參與，以及抗議者在高風險都市空間中遊走、穿梭和游擊的空間知識與技藝。

四、如水抗爭：流動抗議中的軀體—物質參與

就如流水革命（Be Water Revolution）的命名所示，2019至2020年蔓延全港的社會運動是一場極為依賴身體移動與空間策略的抗爭。香港抗議者擁抱了水的具象，凸顯整場運動去中心化的動員模式，以多樣化和靈巧的抗議曲目擾亂政府和防暴警察的部署。相較於2014年雨傘運動的定點佔領與可辨識的領導組織，2019年的流水革命從過往經驗中汲取教訓，轉向「無大台」（*mo4 daai6 toi4*）、網絡協作與匿名決策的開源策略（Lam 2019），這種「運動」也如Matthews（2023）所言，構成了水的具體展現。抗議者的行動經常因地制宜、即興地進行變更：「集會可能變成遊行；遊行可能突然改變方向；特定行動的焦點可能在行進過程中才浮現」（Dapiran 2019；轉引自Matthews 2023: 1830-1831）。

如水抗爭一詞源自國際武打巨星李小龍1971年著名的訪談，並在2019年受到香港抗議者和評論者廣泛引用：「水可以流動，也可以衝擊，成為水吧，我的朋友」（“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 — be water, my friend”）。這句話成為「運動」的核心格言，並延伸為一套結合抗議戰術與空間感知的語法：當面對防暴警察或親中團體時，抗議者要「如冰般堅強」、像水一樣穿梭城市、「如露聚集」進行快閃、「如霧般散去」以避開抓捕，「完全迷惑了警察、政府和北京的政治局」（Anderlini 2019）。如水因而構成了一種高度流動的抗爭型態，也反映抗議者在大氣湍流和國家暴力鎮壓的惑亂狀況中不斷重新定向，生成新的主體位置與社會秩序。

吸收了李小龍的武術哲學，如水作為具有規範性的物質隱喻，表達了群眾應如何溢出警察框定的維安空間，發展各種顛覆性的身體作為和移動。抗

議者遊走於都市各處，擺脫圍困，也在游擊過程中重新編排空間的社會功能和意義。這涉及策略與裝備的調整，亦促成主體性、倫理判斷與知覺感知在「運動」中經歷情動轉化和重構過程。那麼，流水革命抗議者如何在大氣警戒下，與周遭的社會物質環境協商其抵抗實作？在上一節，我已討論食催淚彈觸發的呼吸—情動具身化歷程，這一節則以如水抗爭聚焦「運動」的軀體—物質參與維度，並從兩個向度展開討論：一是「物質的重新定向」（material reorientation），探討抗議者如何與物共構，因應環境與策略需求而挪用和轉化日常物件為抵抗物質；二是「空間的重新定向」（spatial reorientation），即身體如何在移動和逃逸中產生差異化的地理知識，同時體現抗議者面對整體與未來不可預知性的姿態。

（一）物質的重新定向：抗議身體的「如水」具象

2019年6月12日早上，從集會場地傳出「全世界要人」（*cyun4 sai3 gaai3 jiu3 jan4*）的訊息後，在金鐘留守和不斷加入的群眾開始架設路障阻擋警方推進和清場。抗議者逐漸學習到，現場任何物品都可能變成一件有用的抗爭工具。例如化名P的抗議者在訪談中回憶：

原來身邊的任何東西……垃圾桶、鐵馬，街邊的雜物，都可以很有用。那時候，我聽一些陌生人的「大哥哥大姊姊」（有經驗的抗議者）說，三個鐵馬，加上幾條索帶（捆成三角形結構），就可以變為有用的路障。（訪談，2023-02-18）

P 當時還是高中學生，從未預料自己即將置身衝突升溫的現場。他描述自己在警察總部附近的地理位置，以及如何在嘈雜混亂的環境中，跟隨他人指示搬運和部署物資。他打開手機的Google Maps應用程式，向我指出受到警察封鎖的主要道路、行車天橋難以通行，而他當時身處的位置（添馬公園旁小徑）則成為抗議者的行動通道。那一刻，他們與都市環境、物質和其他身體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轉變。

面對大氣警戒和警方圍捕，流水革命發展出多樣化、靈活且具創造性的

策略進行應對與抵抗。「運動」隨著毒氣在城市中蔓延，眾多原本屬於日常移動、個人健康防護與休閒運動領域的物品，都被參與者挪用並轉化為具有抗議意義及各種戰術功能的工具（在香港抗議者之間被稱為「文具」*man4 geoi6*）。這些物件的來源與組成方式極其多元：部分透過海外網路平台訂購，如戰爭遊戲裝備、軍規防具、防毒面罩（俗稱「豬嘴」*zyu1 zeoi2*）與濾罐等；也有大量取自本地超市、藥房、百貨公司和運動用品店的日用品；更有來自抗議現場即興拼裝的物資，包括鐵馬、垃圾桶、雜物與竹枝等街道可得材料，這些物資常以人鏈運送、隨機聚合於街頭前線。

612事件後，抗議者身處高度緊張與衝突的都市氛圍，也將自身實作轉向戰備狀態，既在社會動員的意義上開展「運動」，也在物理意義上開始移動，產生了一系列如水抗爭的身體具象（figuration of Be Water protest bodies）（如圖1）。許多身體包覆技術逐步往各處散播：曾經食彈的身體，學會了運用保鮮膜、雨衣、運動冰袖、實驗室面罩、加裝濾棉的防毒面罩等物件防護呼吸道與皮膚。抗爭裝備及其應用知識在日常與行動現場之間流通，透過AirDrop、網路頻道及即時通訊、現場口耳相傳等形式，在群眾當中建立起多個戰術協作與資訊交換的行動網絡。這些知識和裝備的交換提升了抗議者對於城市地勢、風險的即時回應能力，進一步強化他們的連帶關係與戰術默契。

流水革命參與者對於日常物件的挪用與轉化，不限於加強身體抵禦國家暴力的耐受性，也經常與更積極主動的反擊曲目緊密結合。例如為了應對催淚瓦斯的攻擊，香港抗議者發展出以水潑灑催淚彈、冷卻金屬外殼的技術，以阻止其升溫釋放氣體（晴報，2019-06-20）。另一些人使用羽毛球拍、網球拍等體育運動器具，將催淚彈擊回警察陣線或改變其煙霧散佈方向（自由時報，2019-08-24），顯示催淚瓦斯作為具有物質不穩定性的大氣調節技術，其效力受限於氣象與地勢等物理條件，卻也因此成為抗議者可能介入和擾動的對象。面對遍佈全城的國家監控技術，抗議者則以雨傘與噴漆遮蔽地鐵、購物中心和街頭的監視鏡頭，甚至推倒被認為與中國「天網」系統連線的智慧燈柱。抗議者在燈柱殘骸上張貼「拒絕極權監控」、「反抗不義政權」等標語（立場新聞，2019-08-24），在街頭具身地挑戰中國政府的數位治理系統。



圖1 612文宣：香港抗議者防護裝備示意圖

資料來源：沃草（2019），轉載自「反送中文宣谷」Telegram頻道。

這些抗議實作均促發了物質的重新定向過程：都市各處的日常物件在抗爭情境下被重新發明，變得具備戰術意義，且能保障身體在大氣暴力下依然具有作為和移動能力（capacity of doing and moving）。抗議者也通過線上和現場即興學習，以有限資源拼湊出符應特定情境的文具，其中物質是騷動且具有生機的，與身體共構為政治行動者。與此同時，由於現場環境充滿噪音且情勢緊張，群眾發展出一套「無聲語言」，以手勢、動作與默契進行即時溝通。這些身體編碼亦與物質構成了抗議的動態拼裝。

流水革命湧現的抵抗物質⁷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它們保護抗議者的肉身免於警方武力（如催淚彈、橡膠子彈、警棍等）侵襲；另方面，它們改變了衝突的場域條件，如阻擋警車行徑、劃分安全空間、延緩防暴警察推進等。這使得抗議者能對空間流動性實施操作，達成癱瘓交通、凝聚士氣、延續集體情緒等情境性的政治目標。換言之，都市中看似尋常、原無關聯的物品，正是在大氣暴力的壓力與集體行動的需求下，其功能和意義被重新定向，超越其原

7 有關流水革命初期抗議者的基本裝備、物品及其使用方式的詳細介紹，可參見〈反送中的「抗爭背包」：香港示威者的街頭物資清單〉一文（轉角國際，2019-06-17）。

初的日常性，形成持續支撐抗議身體和大規模集體動員的「情動與物質組構」(affective and material configurations)。

P 在訪談中提到，抗議者之間會使用「魔法」(*mol faat3*)一詞形容這些被重新定向，用以擾亂秩序或反制警方的抗議物品。在抗議現場，魔法的使用彰顯了如水抗爭的創意策略與物質能動性(material agency)，也在身體實作的層面上牽引出主體性的轉變。例如，P 由最初從事補給支援的和理非，轉化為主動與防暴警察對抗和周旋的「前線勇武」(*cin4 sin3 jung5 mou5*)。這一角色轉換顯示他在實踐如水的過程中，也不斷重塑自身認同與政治位置。他向我分享參與「三罷行動」(*saam1 baa6 haang4d dung6*)，堵塞地鐵站的故事：

9月1日開學，三罷的時候我沒有特別的行動，只是不斷地去堵塞任何的地方……那時候就是塞住路口，大家都站到那裡。後面的人要去上班，就咒罵我們，但我們沒有理會。勇武派有架設路障，有些巴士停在路中間。之後是罷工、罷課、罷市，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去罷課，去合理化其他人罷工罷市，或者是去做「塞」的人，這樣他們才有原因，讓他們「合理化」自己罷工。

(提問：你會如何堵塞地鐵交通？)

例如我們以身體擋著車門不讓列車駛走，或者是用室內裝潢需要用到的那些「填縫膠」，把入票機塞住。這種膠漿很有用，可以塞住任何東西。它本來是液體，擠出來塞住以後會固化……三罷行動就是，我見「勇武」就是去塞道路，我就只能做一些「街坊」也可以做到的事情。或者是在現場咒罵警察啊，拖住大家的腳步。現場氣氛也很和平，反正大家也不想上班吧，就只有少數人在罵[抗議者]。(訪談，2023-02-18)

有趣的是，這些常見於五金舖和超級市場，能夠迅速從液態（可以填補任何形狀的罅隙，也具有黏性，一時三刻難以清除）轉變為固態（柔軟而有彈

性，成為它佔據空位的形狀）的矽酮樹脂，也發揮了相似的政治效果——如同那些卡在月台與列車中間的抗議者身體一樣，把目標「黏合」起來，操作群眾移動性（crowd mobility）以拖延列車開駛的時間。這種實踐展現的身體在街頭行動的靈活性，揭示了如 P 這樣的抗議者如何在都市大氣／氛圍、社會物質環境與他人的交織當中經歷重新定向，亦即通過製作與拼裝抗議物質，將城市空間轉化為群眾與政府對抗的舞台。

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面向，是抗議升級（escalation）與物質性的交織。正如勇武除了是一種策略選擇之外，更是因應多種物質實作而激進化的身體，以爭取其他「同路人」（tung4 lou6 jan4）和市民的理解與共鳴。抗議者會藉由改變身體姿態與裝備轉換而「進化」（zeon3 faa3），例如從最初的手持標語、身穿校服或日常街坊裝扮進行和平靜坐、遊行抗議開始，逐步轉變為半遮掩、半防護狀態跑任務（持雨傘遮掩、穿黑衣運動鞋、背上背包、配戴防毒面罩與眼罩），再升級為更積極反擊的前線戰力（投身於更高風險動作，例如手持盾牌抵禦子彈、投擲汽油彈與燃燒物等）。⁸這些轉化過程均呈現流水革命參與者與物共構的實作關係：身體與不同抗議物質糾纏，開闢了將抗爭從忍受苦痛和非暴力形式，轉向主動攻擊和使用暴力的可能性。

即使身處最前線，勇武的攻擊方式（如俗稱「火魔法」fo2 mo1 faat3的汽油彈）亦難以與警方的武力規模達到對等。P 指出，這些實作只是為了短暫牽制警方推進。實際上，前線抗議者往往需要更為靈巧的判斷、移動與持續獲得他人支援，才能在武力極端不對等的關係中維繫行動空間。P 介紹了在前線出現的各種魔法攻擊，包括投擲油漆、雞蛋甚至昆蟲，干擾警力或造成對方混亂。他強調自己在實作中從和理非角色，僅在後排傳送物資與補給，到逐漸走向前線實踐更高強度的動作、堵路和破壞任務。這呼應了Feigenbaum（2014）的觀點，即社會運動中的各類物品與媒介，即使原本毫無關聯，也會在抗爭情

8 對於這一連串抗議身體姿態與服飾的視覺再現，可見於香港漫畫家「Man 僧」（筆名）於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所創作的一幅插畫（原刊於《熱血少年周刊》）。該作品雖誕生於較早時期，卻以預示性的方式描繪了後來於2019年爆發的流水革命中抗爭升級的樣態，並在運動期間廣泛流傳（三立新聞，2019-10-06）。相關圖像亦可見於諸多香港藝術家（2020: 51）。

境下匯聚為抵抗物質 (resistant matters)。無論是圍欄、路障、數位設備、毒氣、防護裝備或是自製工具，都隨著流動、拼裝與連帶感的累積，逐漸被賦予新的象徵與情動價值，成為一些愈來愈黏著 (become “stickier and stickier”) 的存在 (Feigenbaum 2014: 17)。它們也作為遍佈都市的「氣候媒體」向警方和社會大眾傳遞政治訊息，在「運動」與都市環境和群眾動態的協商過程中，情動地參與抗議者的主體性生成和轉化。

(二) 空間的重新定向：都市游擊的地理知識與動覺智能

如水抗爭具象的抗爭姿態，強調群眾的流動性和環境敏感性。即使在某些情境下，短暫停留或許有其戰術意義，但靜止往往意味著「運動」的困頓：無法逃逸、缺乏彈性，甚至曝露於警方圍捕的高風險之中。如水之所以成立，關鍵在於現場眾多抗議者持續「運動」，不斷調整彼此的身體作為與空間策略，進而在城市各處激發並維持抗爭效能：

我們到一個地方，應該像水一樣，完成一個行動後就應離開。造成破壞後要馬上退場，融入人群。如果防暴警察站在這裡，而和平抗議者在那邊，那我們可以在沒有警察的地方設置路障或擾亂交通……總之要一直在移動，不要停下來。(訪談，2023-02-18)

P 的這段敘述提供了如水策略的在地詮釋，強調抗議具有反覆律動的節奏感，並以身體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為核心要義。呼應了這一觀點，政治地理學者 Routledge (1997) 指出社會運動的空間實踐往往展現出複數且動態的移動風格，其中以「蜂群」(swarm) 與「小隊」(pack) 的戰略移動性 (strategic mobility) 為代表：

小隊 (packs) 的成員數量通常不多，有時作為「群眾晶體」(crowd crystals) 促發人們聚集示威。它們並不公開對抗統治權力，而是以隱蔽方式行動，活用地下化的策略、出其不意的手法，以及去領域化移動的不可預測性。小隊能採取將空間去領域化的運動，傾向在空間中

穿行而非佔據。小隊的行動始終預示著即將到來的散逸。相反，蜂群以數量優勢公開對抗統治權力，佔據空間，不論是在物理、象徵、政治還是在文化層面上。蜂群有時是可預測的，也可能是社會運動的前奏或表達。在其他時候，蜂群可能表達出抗議者即時的抗拒、憤怒或喜悅的時刻，幾乎在形成之後就立刻解體。這些運動能動性，小隊和蜂群，可能是相互關聯或相互對立，也可能構成彼此之間的前奏或轉變。它們與空間的關係，領域化和去領域化的關係，始終是相對的，也始終交織在一起。（Routledge 1997: 2167）

作為一場組織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流水革命展現了「蜂群—小隊」混合的戰術型態。「運動」參與者靈活穿梭於佔領與逃逸之間，來回切換行動規模與密度，體現群眾動態的易變性與不穩定性。例如，「和勇不分」（*wo4 jung5 bat1 fan1*）這一口號捕捉了角色的可交換性與策略彈性：群眾可以同時參與和平集會、短暫佔領，也能迅速轉為分散的小組行動，包括突襲式堵路、攻擊警車、監視警方部署，或進行其他破壞行動。這些作為往往具有偶發性和短暫性，手足在完成任務後迅速解散，重新匯入蜂群，增加警方辨識與追蹤的難度。此外，抗議者如水流動的移動模式也包括更廣泛的社會網絡和支援實踐。許多市民自發組織「家長車」（*gaa1 zoeng2 ce1*）接送網絡，透過即時通訊軟體與人際關係協助抗議者脫離現場，避免遭警方拘捕。在這種「蜂群」與「小隊」交錯、動靜轉換的戰術實踐中，都市環境一方面限制抗議行動的可能性，另方面也提供豐富的策略資源與可能的逃逸路徑。

在衝突升溫的香港，缺乏閱讀都市複雜地勢和人群流動的能力，對於抗議者來說往往是充滿風險和致命的。受訪者 I 告訴我，他曾誤以為散佈於棋盤狀街區的唐樓天台是合適的躲藏地點，便與同伴上樓觀察形勢，不料遭防暴警察突襲上樓拘捕。後來，他在不遠處發現了警方無人機的身影（訪談，2023-02-08）。受訪者 N 則憶述了在沙田遭防暴警察拘捕的經驗。當時他與身邊的群眾逃離示威現場，遭警方從中切入，把他們「打散」（*daa2 saan2*）為幾個數十人的小群體，進而在商場外，且沒有記者在場的公園「收網」（*sau1 mong5*）圍捕（訪談，2022-07-14）。受訪者 P 也提到當他身處屯門抗議者與防暴警察對峙的前線，有時候會看不清前方建築物內的狀況。有一次勇士正在設置大

型路障，建築物裡的防暴警察突然衝出來搜捕，他和其他前線抗議者卻被後方的和理非人群（有的「還在『撒溪錢（*saat3 kai1 cin4*，即撒紙錢）』沒有逃走」）阻塞，夾在兩者之間難以脫身，終被近距離的警員抓住壓倒（訪談，2022-02-18）。

流水革命產生了多樣化的抗議曲目與彈性調整、快速移動的行動風格。隨著街頭衝突頻繁爆發，各類網路平台與即時通訊軟體（如Telegram 頻道、Signal加密通訊應用程式等）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增生，為穿梭各大衝突熱點的群眾提供實時地理資訊與風險評估依據。這些線上工具除了支援即時通訊，也形成一些環境感知網絡，使抗議者能瞬即掌握當地的地理條件、警力部署、現場氣氛、人群密度與動向、可能的包圍或逃逸路線，進而判斷現場形勢及採取策略調整。如同許多新世紀的佔領運動，流水革命流動式的游擊和佔領實踐，仰賴大量線上與線下（online/offline）作為的來回切換。抗議者不僅以身體感知周遭環境，也透過數位平台即時整合並擴散這些「都市氣象知識」（urban meteorological knowledge）。例如，香港紀錄片《時代革命》便記錄了這類集體感知網絡的組成與運作過程，片中一位Telegram頻道管理員描述了他們如何召集「哨兵組」（*saau3 bing1 zou2*）、「地圖組」（*dei6 tou4 zou2*）、「廣播組」（*gwong2 bo3 zou2*）等行動單位，透過肉眼觀察、數據即時上傳與遠距實時交流，形成融貫的民間情報系統。他表示：

我們的Telegram頻道有幾萬個訂閱者，我們估計有勇武行動的行動日，然後就會約一班人出動……有10至20個朋友會幫我們到現場做哨兵。大概有10個人會在我們的總部。我們會分兩邊，一邊輸入數據，立刻（通過哨兵消息和各媒體直播）衡量現場「戰區」的情況，然後想哨兵應該要站的位置，有沒有即場調動。至於「地圖組」的朋友則會把所有資訊即時上載到HK Map（網上地圖）。我們還有「車手組」，兩至三隊「咪手」（現場廣播員）……就算我出去衝擊，都要別人救我，倒不如我找一個適合自己的角色。我本來是一個不懂看Google地圖的「港女」，但我慢慢學習……我們頻道的管理員其實全都素未謀面，不知彼此背景，不知職業、年齡，但透過一個Telegram頻道，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周冠威[導演] 2021，25:44~27:18）

此外，抗議者在抗議現場面對動盪情勢和身兼多重任務，往往無暇隨時閱覽手機裡的資訊。因此，他們依據自身背景與角色，逐漸發展出差異化且具個人色彩的都市遊走知識和習慣。例如受訪者 P 認為，香港有些商場是適合躲藏的，例如九龍站上蓋的圓方，因為「它的地方（面積）夠大，很多路可以走。商場裡面有金、木、水、火、土等區域」（訪談，2023-02-18）。不過，原則上，P 覺得商場和其他建築物並不適合躲藏：

它們都是密閉空間，就算有幾個出口，（警方）很容易就可以佈防。相反，如果我們去到市區或者平地的話，要怎麼走，或跨到對面的空間，都可以做到。但是，商場的話就難以走動……應該這樣說，一定不可以躲在任何的「建築物」裡面，也最好不走進去。例如行人天橋，這也是建築物來的吧，我們（勇武）會知道這是盡量不要去的地方。（同上引）

P 習慣在完成任務後直接撤出抗爭區域，遠走至郊區或警力薄弱地帶：

我不會在現場躲起來，而是直接離開，就是離開這個示威範圍，到遠一點的地方。甚至遠到那些狗（警察）不會部署路障、警車，或有人巡邏的地方……抗爭發生在元朗的話，如果真的需要逃跑，我會走到錦上路和朗屏中間的地帶。可能「抖啖氣」（喘一口氣），吃點東西，會感覺比較好。或者在元朗的話，我會直接先回家，休息一會再出去（抗爭），家裡有什麼物資需要的話也可以順便帶上。（同上引）

隨著前線抗爭經驗的累積，P 也漸漸意識到「地區知識」的重要性，「當你有多熟悉（示威所在的）那個地區，就有多大的生存機率」（同上引）。721 事件發生後，大批群眾湧進元朗抗議，作為在地居民，P 會跟他私下認識的抗議者說明當區的特殊地理環境：

當有什麼事情發生，就走哪一條路。或是在這個商場什麼地方有防火門，可以直通地鐵站，或者直接下地面。或者哪條路會通往哪條路，以及哪一個位置一定會碰到狗（警察）的。還有，因為有些朋友就是運動最前線的勇武派，他們開始有自己的團隊。他們可能聽完我說後，自己在腦海分析。分析過後就知道要在哪個地方設路障，群眾要在哪一個地方聚集。選定地方後，他們就開始呼喚「和理非」（群眾）過來傳遞物資和進行掩護。（同上引）

受訪者 M 說，為了持續參與香港各區的示威，他所在的勇武小隊會依據當日場景選出熟悉當地的隊員為「領隊」，專責安排逃脫及丟棄抗爭裝備的流程：

例如在旺角，不要沿著彌敦道跑，這很愚蠢，路面夠寬的話，很快會被警車追上。我們會預先想好要在哪條小巷拐彎，在裡面換衣服並把身上裝備全都扔掉，再「手空空」地從小巷另一頭出去，比較安全……這些安排都需要住在不同地區，對不同地方較熟悉的同伴幫忙去想，運用這些優勢。逃走途中我們也會對照實時地圖，注意哪些路線是危險，不能走的。（訪談，2023-06-08）

這些例子均凸顯出，流水革命不僅是一場規模龐大的社會動員，更包含了高強度身體移動及作為，經歷物質與空間重新定向的「運動」。對於這些時刻處於動態的身體（body-in-motion）而言，知識並非單純「通過文字、圖示和觀念來思考」，而是「經由作為的經驗而產生的直觀覺察（an intuitive awareness generated by doing and experience of this doing）」（Adey 2017: 185），即一種把思維與運動結合的動覺智能（kinaesthetic intelligence）。水作為揉合物質性和政治性的具象，把抗議者的身體、散佈都市各處的物質、群眾動態，甚至大氣／氛圍親密地纏繞起來。這種動態與Serres（2018: 57）提出的「漩渦」具象不謀而合。他指出，流動性並非固體狀態的例外變形或崩解，而是所有物理現象（及感知）的源起：在湍流運動中，眾多分散式、處於準穩定狀態

的漩渦（meta-stable vortices）與局部性秩序才得以湧現。¹⁰置於香港的抗爭脈絡中，漩渦可視為當地大氣／氛圍物質性的特定拓撲組構（topographical configuration）；如水抗爭則為從大氣湍流中（暫時地）不斷湧現的群眾運動模式，其中抗議者與周遭社會物質環境持續協商，生成流動的知覺感知和軀體參與方式。

水的具象思維和具身化理解，也進一步將香港抗議「運動」延展至全球化、數位媒介與身體政治的交錯領域。Wu（2022）指出，如水抗爭作為具有標誌性的抗爭口號，連結了在地與跨地的多元經驗軌跡：「液態具身化（liquid embodiment）及“Be Water”不應僅被理解為隱喻或修辭語言，而是一些透過香港視角呈現，根植於處境式現實的積極展演與生命經驗」（Wu 2022: 75）。從身陷大氣暴力中非自主呼吸的食催淚彈，到如水抗爭的與物共構，反向介入身體呼吸節奏和群眾移動性，「運動」不斷生成了在差異化風險和多變地勢中靈活遊走的抗議主體。這種與環境親密纏繞的情動轉化，具有流體的生成動態（the generative dynamics of flux），至於抗議者從都市游擊中創建的知識形式則顯示，「思維」和「行動」無法與維繫生命的呼吸節奏完全分離：

思想和語言被感知為不可分割，並與吸氣和呼氣同樣密切相關。吸氣時的停頓就是思考的停頓；而思考就是感受，去關注事物，聚集周遭環境的力量和能量，回憶或做好準備。（Ingold 2020: 164-165）

如同 Ingold（2020）指出，我們在呼吸的同時，也讓他者與我們共呼同息，於是靈魂便在生命之流裡形成一個漩渦，它同時存在於身體的內部或外部，於吸入與吐出的攪動之中顯現。在呼吸這一生命共享的存有層面上，所有

10 Serres寫道：「[在天氣現象中]只需一個瞬間與最小的偏差，就足以形成亂流。轉瞬之後，亂流便在三維流動中形成口袋，一個地方性奇異點。在這奇異點中，流動自轉、反向，它們改變方向、力量、體積。這種變化可能只是偶然與暫時呈現流動穩態（homeorhetic）的性質。我們熟知的這個世界，正是一個這樣的亂流口袋。它是脆弱的，被最小偏斜所構成的圓頂保護著。透過流動穩態的方式，介於穩定與不穩定之間。這個口袋、這顆種子、這座島嶼、這種亂流，能維持一段時間，然後分解，被瀑流帶走——那穿蝕它、破壞它的原子流」（Serres 2018: 98-99）。

人都「受到靈魂的折磨和狂喜所包覆」（同上引：165）。

如水抗爭也能讓我們回頭檢視Ingold (2010) 有關尋路與「運動之思」(the motional thought) 的觀點：棲居者在運動中具身地感知複合、不斷生成的環境，而知識並非在靜止觀察中拼湊而成，「而是在天氣世界裡，於移動的路徑中生成 (knowledge is formed along paths of movement in the weather-world)」(Ingold 2010: S136)。然而，置身於香港2019-2020年的都市衝突，我的田野描述和分析更是沿著「感知的政治性」與「可感之物的政治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Laplantine 2015) 向度，進一步轉化Ingold的表述：因應催淚瓦斯與警方圍捕而持續變動的政治地勢，流水革命參與者被迫在負面的球域棲居條件下忍耐和尋找出路。雖在食彈中同吸共嚙，抗議者之間卻展露出差異化的情動主體化路徑；體現於對化學氣體的反應與耐受，衣物、裝備、地理資訊與抗議物質的運用，對抗議現場的判讀，行為與倫理抉擇等層面。此外，勇武與和理非等經日常語言本地化且相互競合的主體位置，除了涉及身分認同與政治論述的構框（李祖喬 2018），也是源自大氣警戒下身體情動地「為風所纏」(enwinded) 的呼吸、嗅覺、觸覺、動覺等多重感官經驗；通過在「運動」日常中重複、熟練地應對各種平凡或驚險情境，香港抗議者逐漸養成彼此殊異，卻能匯流、互相轉化、模仿、互補和衝突的環境感知模式。

五、理論化「運動」作為大氣暴力中的情動主體化過程

抗議政治研究對於香港流水革命的討論，目前普遍聚焦於它成為新世紀「網路化抗議」(networked protest) 的典範案例 (Ting 2020)。不同研究者在詮釋與關注層面上各有側重，例如探討知識社群與專業人士的動員和參與 (Ma and Cheng 2023)、抗爭策略與暴力手段的激進化 (Lee et al. 2022)，以及情感何以成為動員機制的核心 (Mok 2022)。其中與本文觀點最相關的，是社會學者何明修對傳統社會理論框架的批評 (Ho 2025)，特別是針對以結構隱喻（如資源、機會、基礎）解釋社會運動歷時變遷的模型，它們往往忽視了行動者面對既有條件時的不確定性 (indeterminacy)。何明修借用「行動主義社會學」(actionist sociology) 的視角，分析流水革命如何展現出意料之外的

大規模動員和持續創新的抗議曲目，強調抗議者展現的自主性、創造力與適應力，皆挑戰了傳統社會運動模型的解釋效力。呼應Jasper (1997) 「能动性即靈巧創新」 (agency as artful creativity) 的主張，何明修指出歷史轉折往往來自眾多行動者的抉擇，並在實踐中產生推動社會變遷的動力 (Ho 2025: 20)，而「集體臨機應變」 (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的概念則能捕捉抗議者在關鍵時刻靈活運用既有能力與資源，在缺乏預先規劃的情況下，透過同儕間的協作產出如水般溢出傳統組織和動員機制的創新行動模式：

當面對被引渡至中國法院受審的恐懼前景時，香港人的「開源式協作」所產生的成果，已不僅是解決電腦程式的問題，而是動員了規模龐大、分散於不同空間的抗議行動，發展出嶄新策略，捐助資源支持運動，並開闢新的戰線挑戰當局。他們共同創造出一場前所未有的抗爭運動，跨越了街頭抗議與後勤支援、線下行動與線上溝通、動員與後動員實踐，以及本地城市抗爭與海外離散社群回應之間的界線。

(同上引：24)

相較於資源動員理論、政治過程理論等以組織結構為分析核心，或是Tilly (2008) 所主張，數量有限的抗爭曲目會隨著長時段歷史變遷而逐漸固定下來，何明修強調，「『集體臨機應變』關注的並不在於抗爭實作如何在長期中走向常規化，而更在意運動實踐何以在相對短暫的時間內擴展、增生與變異，開啟一段出乎意料的對抗篇章」 (Ho 2025: 26)。這種從群體內部即興生成的動能，使香港抗議者在面對政權與其代理人前所未見的鎮壓時，得以創造多種新穎的策略應對：包括「遍地開花」 (*pin3 dei6 hoi1 faa1*) 的空間分散策略、「香港之路」 (*hoeng3 gong2 zi1 lou6*) 人鏈行動、流水式快閃的「和你」 (*wo4 nei5*) 系列集會，以及無大台所展現的線上線下協調與國際連線能力。

本文雖同樣使用「集體臨機應變」一詞來理解香港抗議者的策略創新，但與何明修的詮釋不同之處在於，我並不把臨機應變視為主體通過內在意識或理性決策踐行的自主行動，而是進一步詢問：在不斷變化的都市衝突情勢中，抗議者如何透過知覺感知與環境建立關聯？從上文的分析可見，這種即興反應

強調的是食彈場景所觸發的去中心化能動性，其中「作為」並非源於孤立的個體，而是透過人與非人之間的協作，在「社會—物質的分佈式集體」（social-material distributed collective）中浮現（Mol 2021: 94）。在這樣的視角下，如水抗爭展現為一些分佈於空間與時間中的任務，既是身體於毒氣中奮力維繫生命的非自主呼吸，轉化情動定向和動能，也涉及到身處不同位置的抗議者彼此投入勞動、照護和調適。這些作為強調反覆不斷地試探，以回應周遭變化。流水革命參與者在抗爭現場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不應簡化為自主意志與因果決定的對立；相反，這些進食者無需在「行動」（action）與「行為」（behavior）之間劃下非此即彼的界線，他們「既自主又具回應性，既富有創造力又充滿適應性，既帶有渴望又能夠因應情境而調整」（同上引：87-88）。換言之，我所理解的「集體臨機應變」是從大氣的物質動態中湧現，跨身體的情動轉化與實作過程。因此，本文旨在提供一套能夠敏銳感知、分析社會—物質環境變動與身體流動性的理論語彙，以捕捉流水革命非線性且分佈式的「運動」邏輯。

為了拓展這一理論視野，我們有必要回溯抗議政治中的具象思維傳統，事實上，社會運動歷來不乏對物質隱喻的引用。Matthews（2023）系統地追蹤了社會運動理論與水的多重糾纏。他認為水除了被賦予象徵作用之外，更是積極與人類一同召喚意義的生成：「水的譬喻在社會運動分析中是一個重要場域。從洶湧的浪潮與連結的支流，到潮流與高壓水力，水提供了一系列比喻與意象，使我們得以將社會運動理解為動力與力的過程」（同上引：1823）。從不同運動參與者、評論者及研究者如何使用水的譬喻，例如浪潮（waves）、洪水（floods）、渦流（eddies）等等，Matthews認為水詩意地構成我們想像與理解社會變遷的方式。一方面，「水的語言已從早期的『水力結構主義』轉向更複雜的流程導向，但對於水體邊界的依賴仍持續規訓著我們以更為分子化的方式理解社會變遷的可能性」（同上引：1824）。另一方面，「與水一同思考往往隱含著我們對於什麼是正確或好的預設，以及運動應該如何發展、哪些過程應當發生」（同上引）。水具有規範性效應，通常承載了運動策略與意識形態上的傾向，並揭示左派與右派的分野。這種多元化的社會—自然概念的使用，「使我們感知到那些不易被論述分析捕捉的層面，例如水的情動性、身體性、觸感性與經驗性，從而將社會運動、它所依賴的隱喻，以及當前水社會制度，

一併視作互為糾纏的生態系統進行批判」（同上引）。

正是基於對水在情動、具身與物質層面所承載的多重意涵，我認為香港流水革命可被理解為由大氣暴力與湍流所觸發的特殊運動模式，它指涉抗議者以水清洗被毒氣附著的皮膚，如水般靈活地介入群眾動態與戰術移動，亦進一步牽引出眾多情動身體的共在（co-presence），持續生成彼此之間的呼吸同謀關係。水的生成力量讓我們領略到，棲居於大氣球域中的生命，身體暫時失能、受阻乃至受到暴力否定與剝奪，固然構成了受損和無能為力的空間（Joronen 2023a: 776），但這並非故事的全部。在社會「運動」當中，抗議者的能動性未必只被大氣暴力單向地抹除。相反，在駐留、承受與掙脫毒氣圍困和警方圍捕的時刻中，他們也透過沉浸於毒氣的知覺感知與物質共構，實現了持存的「戰鬥呼吸」（combat breathing）（Gabrys 2022; Fanon 1967），亦即在環境災難中安置自我或他者，在窒息中掙扎、在壓制中存活，也創意地生成抵抗警方武器化大氣的具身政治實踐。

在大氣警戒的情境中，「運動」包含了「評價性的參與」（valuing engagement）：「這樣的知識模式，不只是對客觀世界的描繪，更在於實踐之中，通過相互調適與物質轉化所達成的關係性理解」（Mol 2021: 65）。食催淚彈不侷限於生理吞食，也涉及到感官經驗、品味、消化的感知與實作關係：抗議者吸入催淚瓦斯並內攝這些對準皮膚、神經與呼吸系統的刺激物。植根於同吸共嚐的身體脆弱性，十八區食彈、催淚彈放題等本地詞彙既是集體承受苦痛的受難紀錄，更通過不同媒介傳播而召喚出強烈的抗議情動氛圍。這種具身存在模式與Joronen（2023a）的負面地理學觀點有所區別。遭遇大氣暴力的抗議者，並未因此化約為無力抵抗的裸命，反而從中生成複雜的調適和回應。食彈既包含抗議者的近距感知（對氣體的吸入與吐出、身體內部反應與代謝的體察），也涵蓋了遠距感知，包括他們對於警方動向、抗爭運動節奏、全球化的催淚瓦斯生產鏈與本地殖民關係的政治判斷。此外，食催淚彈不斷觸發抗議者的重新定向——其身體即便初始遭受大氣警戒干擾，卻不意味著完全失能。正是在這些限制條件下，身體透過與周遭環境和對象協商而獲得新的知覺感知，打開政治行動的可能性。香港抗議者一方面在否定性大氣／氛圍中駐留、消化驚恐和壓迫經驗，另方面則以游擊方式積極回應這些暴力機制。我主張，這

種「戰鬥呼吸」若未與實際的軀體—物質參與緊密結合，便難以充分揭示主體何以在大氣否定性的時空中忍受、感知與反應，進而實踐情動性的轉化。通過「以運動超越球域」（moving beyond the sphere）的觀點，我們得以描繪集體如何穿越大氣暴力並生成抗爭氛圍的動能及策略。其中，抗議者積極地透過物質和空間的重新定向，形構出新的抗議主體性。

Moore (2011) 認為，情動主體化奠基於一個關鍵原則，即情動是具身的，並且包含生成能力，而非固定不變的完成形態。儘管情動在各學術領域中尚無一致定義，其解釋途徑與方法相當多元，但多數觀點都指出情動並不屬於某個單一主體所擁有的本質或能力，而是：

在關係、變動、脈動與強度之間流動，有時被描述為病毒式的，有時被想像成具有傳染性。情動涵蓋了人類與非人類、生命與物質，它們通過非線性連結與組合運作，在流通中尋找表達並在具體語境中被限定。情動的運動因此是不確定、充滿生命力的，對各種可能性敞開，總是處於一連串虛擬傾向、醞釀與潛能之中。（Moore 2011: 176）

在這樣的觀點下，情動是一系列強度與差異化的顯現，在特定環境當中，「由關係與遭遇所生成的經驗、感覺、感知與情緒，會被納入並延展到話語之中，被符號化、政治化，並且向時間的過去與未來投射，影響著主體化的過程與經驗」（同上引：185）。這意味著情動既喚起感知經驗，也涉入歷史性的建構過程：「一旦情動進入了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異質他者之間的關係，便會被人類能動性與人類主體性所限定、重新導向並重新激活……人類主體能夠辨認情動，並在身體與心理層面加以註記，對它形成看法，再轉化為自身所需的用途」（同上引：186）。因此，情動主體取決於世界的可理解性，它無法在脫離文化脈絡的情況下與世界相遇，其中意義化（signification）總是「內在於人類的存在形式及生命形式，而非外在或可被剝離於其存在或情動之外」（同上引：204）。主體「不僅運用情動——也就是以軀體參與世界——來進行自我反思，還通過它反思一切超越存有（more-than-being）的事物」（同上引）。

抗議者在都市遊走，互相照護，靈巧組裝和運用抵抗物質，正是嘗試超越大氣暴力的負面棲居球域，回應他們身處呼吸脆弱性當中，仍然保有對政治共在（political co-presence）的渴望，這種渴望體現了「為自己也為他人而在場」的倫理傾向（Campos Medina and Jaureguiberry Mondion 2021: 493）。而符應社會物質環境的「運動」則強化了參與者之間的連帶關係和倫理責任。在毒氣和防暴警察逼迫之際，手足彼此圍繞與支持，營造即便身處危險也能緩解焦慮、增強安全感的氛圍。透過身體、物質與技術媒介的共構，香港抗議者開展出不同於靜坐、喊口號、遊行等常規動作及存在方式。例如，勇武的軀體參與形構了新的政治位置，使得更多流水革命抗議者產生「對慣常思維、行動和評價形式的質疑」（同上引：496），開啟主體性的實驗性形塑。

在Ahmed（2006）的分析中，定向是由「身體所能執行的行動」所構成的空間向度，而這些行動又與特定對象的可接近性密切相關。對象是指向行動的路標。某些物件之所以顯得靠近，往往是身體與環境之間持續互動與調適的結果，使其可觸及、感知和操作，從而形構成「我所能及之物的空間範圍」

（Ahmed 2006: 52）。換言之，使用工具或行動本身，總是嵌入於特定物質配置、意向性與知覺條件當中。身體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始終帶有觸覺與印象，這些感覺並非單方面地源自對象，也不完全來自身體本身，而是在兩者接觸交會的皮膚表面上生成，構成了互涉的世界（interworld），即感知身體與世界之間來回往返的開放迴路（同上引：54）。在這種互涉中，身體通過長期與對象接觸和實踐而塑造形體輪廓和行動能力。隨著動作的重複與傾向的累積，身體與世界之間的「身體視域」（bodily horizon）也逐步建立，它界定了積極行動（positive action）的可能性及其界限（同上引：55）。關鍵是，失去定向的時刻對身體視域和行動力具有轉化作用。正是這些令人惑亂的經驗，會打破身體熟悉的感知模式、信念與慣習，甚至引發主體的存在危機。

當習以為常的資本主義布幕落下，威權政府露出赤裸裸的獠牙之時，滑行於權力和武力極度不平衡的斜面，香港抗議者還抓住了什麼（take hold of）？我認為大氣警戒在他們之間引發了感知上的分歧，那些「在慣常情境中應用的判斷和分類反射被暫時中止，但同時為迷失方向和重新定向的可能性打開了大門」（Campos Medina and Jaureguiberry Mondion 2021: 496）。食催淚彈

指向了「運動的身體」遭遇催淚瓦斯的多向度情動反應，也將他們的受害經驗與超越當下暴力情境的歷史訴求（普選權利、城市民主自治和自由）聯繫起來。至於抗議者在充滿催淚瓦斯和警察身影的都市氛圍中進行如水抗爭，則進一步將「運動」推展至廣泛地與物共構的游擊及流動的知識生成過程。在大氣暴力中，這些情動遭遇和身體實作促成了流水革命獨特的方向線（lines of direction）。這些線條形塑出抗議者對周遭空間、物件與他者的感知與情感，也確立了彼此之間是否能夠「連成一線」（become aligned）的倫理關係（Ahmed 2004）。透過與他人、物質與技術協作，抗議者構築了包覆個體與社群的「新皮膚」，讓某些身體彼此連結與協調，同時反對「與威權鎮壓結盟」的身體。如水促使這些行動者積極投入環境感知與反思，重新定位自我與他者、與世界的互動方式。至於湧現自大氣湍流的運動模式與動覺智能，則呈現出一種回應「未來他性」（alterity of the future）的肯認姿態，這種植根於在地情境的社會「運動」理論，強調人類能動性與主體性所蘊含的激進潛能，即「他們對於意義建構的本質開放性，始終指向新的存在方式」（Moore 2011: 22）。

在大氣暴力所形構的負面地理中，我們應如何藉由食催淚彈和如水抗爭的物質隱喻重新思考抗議的政治能動性？拒絕將脆弱性視為能動性的對立面，是重要的理論策略之一。如Butler（2016）所言，脆弱性本身即是政治力量的來源。脆弱性是人類身體與共生性的存有基礎，它揭示我們對他者、對照護、空氣與生存條件的依賴。而抗爭行動正是通過向他者展露身體，使自身可見（appearing to others），將這種脆弱性轉化為道德與政治訴求的媒介。面對警察鎮壓時無法防禦的身體，可能成為公共訴求形成的場所。這種集體脆弱性使得參與者能以「難以預見的方式經驗公共性」（experience “publicness” in unforeseen ways），並在與親密他者的相互依靠中，將風險與傷害轉化為新的政治聯結與抵抗形式（Gambetti 2016: 39）。

Neimanis（2013）在理論化一種新型的女性主義主體性時，描述了我們身體內涵的各種「水性邏輯」（hydro-logics），他指出：「這一主體是後人類主義且具物質性，真實卻又蘊含志向。最重要的是，他能對其他水態身體——無論是人類或超越人類的存在——保持回應性的調適，於政治、社會、文化、經濟與殖民性行星權力（colonial planetary power）的全球流動當中相互感應」

(Neimanis 2013: 23)。對於情動主體而言，水蘊含著概念性的創造潛能：

具象已然存在，也等待被接通。它是描述性的，又帶有期盼。作為對當代主體性矛盾特質的回應，[水的]具象根植在地，也總是連結到全球脈絡，它能凸顯任何所在之處都有危險與肯定性的雙重面向。（同上引：26）

呼應這一思路，我主張當代抗議政治研究需轉向更關注呼吸身體的脆弱性、流動性、環境感知與共構關係的「接地氣」理論框架。過去主流社會運動理論往往採用鳥瞰式視角、抽象且脫離軀體的模型，忽略了當前抗議實踐中身體、環境、物質與技術之間的緊密纏繞。特別是在國家大氣／氛圍暴力持續加劇的現實條件下，抗議者的呼吸、感知、行動與再定向，構成了如水般與社會物質環境持續進行人與非人協商的情動主體化過程。

理論不只是對事實的抽象整合，它塑造了我們如何感知現實的語言、模型與語法結構。作為智識工具，理論讓某些經驗得以浮現，其他則被壓抑或遮蔽。諸如食彈與如水的物質隱喻，既描述現象也指向經驗的多樣性與本土性。Mol（2021）指出：

現實是多重的（reality is multiple），關鍵問題是在哪些具體情境下，何種現實版本被構建、被實現，並產生效果？……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規範性（normativity）也被帶回了現實世界。它不再存在於某個超驗的反事實領域，也不僅僅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性論述。相反，它體現在不同現實排序方式之間的對比之中。在沒有外在超驗標準的情況下，規範性問題無法以絕對方式回答，但仍然可以被提出，而且不止於哲學家在抽象層面上進行辯論，而是在具體實踐中，由每一位參與者於當下直接面對與探問。（Mol 2021: 23）

基於以上分析，我認為社會「運動」也是多重的（social “movement” is multiple），特殊的運動型態在具體情境下，與社會物質環境持續協商並在一

個個參與者的身體實作中生成出來。藉由在都市各處游擊的接地氣「運動」經驗，眾多如水的情動主體化過程也在食彈的抗議者之間誕生。

六、結論

身陷絕境，感官放大，格外清晰的，是氣息。催淚圍城，街巷戰役之間，隔著豬嘴的侷促難耐；棍棒之下，錄入攝影機直播全城共同親歷其境的喘息；在分秒之間，作出生命中最重要抉擇之前，深深吸入、貫徹全身的一口氣。正是這樣的共同經歷，讓我們願意克服恐懼衝上前，願意信任素未謀面的彼此，願意不計成敗與代價，只為再向前一步。痛苦打通了我們心的隔閡，但唯有行動與反抗，才真正將我們連結成一體。我們都見證過，體制徹底崩塌下的真實，也見識過同行者的勇氣，在前線，在社區，在每日最微小的堅持當中。最激進的行動，背後是最純粹、最溫柔的期許。生而為香港人，當我們拒絕活在虛擬的繁華之中，奮起對抗此城無法自主的宿命，浮城便終於落地，真正屬於我們的「香港」，便存在於一呼一吸之間，我們不顧一切去反抗的一刻。

—何桂藍（2020-05-07）《同呼吸，共命運》

本文探討了大氣暴力中的特殊「運動」樣態，闡明香港抗議者如何在大氣警戒的時空中經歷多重的主體化歷程。承接Joronen（2023a）針對身體「無法不呼吸」的界限而提出的「負面球域棲居」概念，以及Ingold（2010, 2011）關於「在天氣世界中棲居、尋路、感知」的論述，我進一步主張，在抗議政治的眾多情境中，抗議者的身體透過與催淚瓦斯交纏，與都市環境及物質實作互為塑造和共構，進而湧現出情動的重新定向過程。這種分散式、集體的動態回應，將近乎使人失能的負面環境條件轉化為得以「同呼吸」（*tung4 fu1 kap1*）的行動場域，形成嶄新的抗議實作。這樣的視角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催淚瓦斯等

大氣暴力形式不僅是壓迫的技術，亦可能催生出跨越身體、廣泛蔓延，具生成性的情動政治動能。

正是通過食催淚彈和如水抗爭這兩個物質隱喻，我將分析焦點放在流水革命中兩種關鍵的身體—環境共構模式：「呼吸—情動具身化」與「軀體—物質參與」。一方面，抗議者從最初面對催淚瓦斯所引發的未知與驚懼開始，經歷了知覺失向，從非自主呼吸中生成倫理想像，並展開現地即興協作與互助照護。此一轉化歷程，與其說來自個體的理性選擇，不如說是一種集體層次的臨機應變，透過不斷重返大氣警戒的衝突現場，身體與物質在互動中生成倫理判斷、照護和協作的開放動態。

另方面，流水革命在更宏觀層面上展現出顛覆性和激進化的身體作為與空間移動模式。香港抗議者穿梭於都市各處，以游擊方式逃脫圍堵，並且在此過程中適應高風險環境，重組空間的社會機能與意義。如水具象地呈現出抗議者主體性與感知模式在「運動」中的變異和重塑。這一過程可從兩個維度理解：其一為「物質的重新定向」，即抗議者透過與物的分散式協作關係，挪用日常物品為抵抗工具；其二為「空間的重新定向」，即身體在移動、逃逸與回返中生成細緻的差異化地理知識與動覺智能。

由此看來，儘管催淚瓦斯以奪取呼吸作為大氣警戒策略，讓政府暫時「清空」或重新佔領空間，但群眾「運動」的政治潛能並未就此窮盡。身體暴露於大氣暴力之中，未必化約為純粹的裸命，反而展露出身體與社會物質環境的不斷協商和調適。更甚者，有經驗的抗議者正是從這種球域棲居的脆弱性出發，透過線上與現場的串聯回應警方、臨機應變且具創造性地進行抵抗，將大氣暴力的多重情動效應導向社會動員的生成力量。

這些針對大氣警戒的軀體參與也有助於抗議政治研究與情動理論之間的橋接。特別是有關情動與語言之間存在差距，又彼此交織的張力，以及對於更開放且敏感於環境變遷之關係性主體的想像。無論是進食催淚瓦斯還是如水遊走的身體存在模式，均突破了社會理論對於人類「主體性」的傳統預設（理性自主決斷或備受結構條件決定），展現出親密且分散的實作關係，讓香港抗議者們從湍流的大氣／氛圍與非自主呼吸中獲得「啟發」（inspiration），在維繫脆弱生命與激發集體動員之間，不斷生成新的情動主體化路徑。

參考書目

三立新聞

- 2019 「被政權逼的！」5年前插畫神準預測 香港抗爭者進化史 [A 5-Year-Old Illustration Predicted the Evolution of Hong Kong Protester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13978&From=Search&Key=%E9%A0%90%E8%A8%80%E9%A6%99%E6%B8%AF%E6%8A%97%E7%88%AD%E8%80%85%E9%80%B2%E5%8C%96%E5%8F%B2>, 10月6日 [October 6],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中信圍困團隊

- 2020 中信圍困日記 [Siege of Citic Diary]。香港：玻璃樹文化有限公司 [Hong Kong: Glasstree Press Limited]。

天氣之子（化名Telegram 頻道）

- 2019 民眾防護相關情報：催淚瓦斯濃度及區域影響 [Public Protection Information: Tear Gas Concentration and Affected Areas] Telegram 頻道 [Telegram channel], 11月18日 [November 18],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立場新聞

- 2019 示威者拉倒智慧燈柱 警偉業街施催淚彈、德福平台射胡椒彈 [Protesters Topple Smart Lampposts: Police Fire Tear Gas on Wai Yip Street and Pepper Balls at Telford Platform]。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collection.news/thestandnews/articles/100132>, 8月24日 [August 24],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自由時報

- 2019 反送中網球王子是你？示威者拿球拍回擊催淚彈 [Anti-Extradition “Tennis Prince”: Protester Uses Racket to Return Tear Gas canister]。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95131>, 8月24日 [August 24],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何桂藍

- 2020 同呼吸 共命運 [Breathing Together, Sharing Destiny]。何桂藍臉書專頁 [Ho Kwai Lam Facebook page]。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33060558395877&set=a.333060521729214&type=3>, 5月7日 [May 7],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李祖喬

- 2018 勇武抗爭：香港的知識分子與暴力／武力的觀念 [Militant Resistance: Hong Ko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Idea of Violence/Force]。刊於《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The Age of Social Movements: The Trajectory of Hong Kong's Politics of Resistance]，頁207-221 [pp. 207-22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沃草

- 2019 我係香港人：2019反送中催淚彈下的一國兩制 [I Am a Hong Kong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under Tear Gas during the 2019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atchout.tw/projects/hongkonger/>,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周冠威（導演）

- 2021 時代革命（電影）[Revolution of Our Times (Film)]。香港：獨立發行 [Hong Kong: Independent distribution]。

香港 01

- 2020 港版國安法：警方首次舉「紫旗」警告港獨又號，盤點警7種顏色旗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Police Raise Purple Flag for the First Time to Warn against Hong Kong Independence –Summary of the 7 Police Flag Color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hk01.com/突發/492660/港版國安法-警方首次舉-紫旗-警告港獨又號-盤點警7種顏色旗>, 7月1日 [July 1],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晴報

- 2019 示威者用水淋熄催淚彈揚威國際 外媒讚簡單有效或致警方升級 [Protesters Extinguish Tear Gas with Water -- Praised by International Media as Simple and Effective, May Trigger Police Escalation]。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 6月20日 [June 20],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楊威利修

- 2023 香港祕密行動 [Secret Operations in Hong Kong]。臺北：一八四一出版有限公司 [Taipei: 1841 Publishing Limited]。

端傳媒

- 2020 重磅影片：超過16000枚催淚彈，給香港留下了什麼？[Feature Video: Over 16,000 Rounds of Tear Gas—What Has It Left behind in Hong Kong?]。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728-hongkong-video-live-with-tear-gas>, 7月27日 [July 27],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October July 14, 2025]。

諸多香港藝術家

- 2020 傘下存志：香港反送中社會運動文宣作品集 [Voices under the Umbrella: A Collection of Visual Propaganda from the Hong Kong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香港：Umbrella Uprising [Hong Kong: Umbrella Uprising]。

轉角國際

- 2019 反送中的「抗爭背包」：香港示威者的街頭物資清單 [The “Protest Backpack” of the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A Street Gear Checklist of Hong Kong Demonstrators]。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876893, 6月17日 [June 17],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Adey, Peter

- 2017 *Mobility*. London: Routledge.

Ahmed, Sara

-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Queer Phenomenology: Orientations, Objects,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Happy Objects*. In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Melissa Gregg and Gregory Seigworth, eds. Pp. 29-5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erlini, Jamil

- 2019 Hong Kong’s “Water Revolution” Spins Out of Control.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ft.com/content/d1f60a3a-cd58-11e9-b018-ca4456540ea6>. Accessed July 14, 2025.

Brown, Jennifer, Carey E. Lyons, Carlee Todd, Timothy Monko, and Roman Tyshynsky

- 2021 Reevaluating Tear Gas Toxicity and Safety. *Inhalation Toxicology* 33(6-8): 205-220.

Butler, Judith

- 2016 *Rethinking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In *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 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eds. Pp. 12-2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Cachelin, Shala

- 2023 The Suppression and Othering of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s Through Tear Ga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54(6): 513-533.

Campos Medina, Luis, and Josefina Jaureguiberry Mondion

- 2021 The March as a Safe Space and Dynamics of Resocialization. *Space and Culture* 27(4): 488-500.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doi.org/10.1177/12063312211040202>. Accessed July 14, 2025.

Chan, Emily Ying Yang, Kevin Kei Ching Hung, Heidi Hoi Yi Hung, and Colin A Graham

- 2019 Use of Tear Gas for Crowd Control in Hong Kong. *The Lancet* 394(10208):

1517-1518.

Choy, Timothy

- 2011 *Ecologies of Comparison: An Ethnography of Endangerment in Hong Ko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oy, Timothy, and Jerry C. Zee

- 2015 Condition—Suspens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30(2): 210-223.

Classen, Constance, ed.

- 2005 *The Book of Touch*. London: Routledge.

Classen, Constance, David Howes, and Anthony Synnott

- 2002 *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London: Routledge.

Dapiran, Antony

- 2019 Be water!": Seven Tactics That Are Winning Hong Kong's Democracy Revolution. *The New Statesman*, August 1.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2019/08/be-water-seven-tactics-that-are-winning-hong-kongs-democracy-revolution-2>. Accessed July 14, 2025.

de Larrinaga, Miguel

- 2016 (Non)-lethality and War: Tear Gas as a Weapon of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9(3): 522-540.

Fanon, Frantz

-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Charles Lam Markmann, trans. London: Grove Press.

Feigenbaum, Anna

- 2014 Resistant Matters: Tents, Tear Gas and the "Other Media" of Occupy.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11(1): 15-24.
-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New York: Verso Books.

Feigenbaum, Anna and Anja Kanngieser

- 2015 For a Politics of Atmospheric Governance.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5(1): 80-84.

Furuhata, Yuriko

- 2022 *Climatic Media: Transpacific Experiments in Atmospheric Contro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Gabrys, Jennifer

- 2022 *Citizens of Worlds: Open-Air Toolkits for Environmental Struggl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ambetti, Zeynep

- 2016 Risking Oneself and One's Identity: Agonism Revisited. In *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 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eds. Pp. 28-5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Graham, Stephen

2015 Life Support: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Urban Air. *City* 19(23): 192-215.

Heidegger, Martin

1971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p. 145-161. New York: Harper & Row.

Ho, Ming-sho

2018 From Mobilization to Improvisation: The Lessons from Taiwan's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2): 189-202.

2025 Be Water: 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Protest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owes, David

2019 Multisensory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8(1): 17-28.

2022 The Mis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Tim Ingold and an Alternative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2(4): 443-466.

Howes, David, and Constance Classen

2013 Ways of Sensing: Understanding the Senses i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Ingold, Tim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2010 Footprints through the Weather-World: Walking, Breathing, Know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121-S139.

2011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0 On Breath and Breathing: A Concluding Comment. *Body & Society* 26(2): 158-167.

Jasper, James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ronen, Mikko

2023a Atmospheric Negations: Weaponising Breathing, Attuning Irreducible Bod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41(5): 765-783.

2023b Life of the Wounded: Rethinking Settler Colonial Power in Palestine. *In* Encountering Palestine: Un/making Spaces of Colonial Violence, Mikko Joronen and Mark Griffiths eds. Pp. 239-261.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Kenner, Alison, Aftab Mirzaei, and Christy Spackman

2019 Breathing in the Anthropocene: Thinking through Scale with Containment

- Technologies. *Cultural Studies Review* 25(2): 153-171.
- Lam, Oiwan
- 2019 The Organisation and Future of Hong Kong's "Open Source" Anti-Extradition Law Movement. Hong Kong Free Press, July 21.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hongkongfp.com/2019/07/21/organisation-future-hong-kongs-open-source-anti-extradition-law-movement>, Accessed July 14, 2025.
- Laplantine, François
- 2015 *The Life of the Senses: Introduction to a Modal Anthropolog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 Lee, Francis L. F., Edmund W. Cheng, Hai Liang, Gary K. Y. Tang, and Samson Yuen
- 2022 Dynamics of Tactical Radicalisation and Public Receptiveness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52(3): 429-451.
- Leff, Jack
- 2021 Expanding Feminist Affective Atmospheres.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doi.org/10.1016/j.emospa.2021.100844>
- 2024 An Alchemy of Smoke and Flame: The Politics of Tear Gas Use against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 Ma, Ngok, and Edmund W. Cheng
- 2023 Professionals in Revolt: Specialized Networks and Sectoral Mobilization in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2(5-6): 648-669.
- Matthews, Jamie
- 2023 Waves, Floods, Currents: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Water in Social Movement Analysis. *Antipode* 55(6): 1822-1840.
- Mbembe, Achille
- 2003 Necropolitics. *Public Culture* 15(1): 11-40.
- 2021 The Universal Right to Breathe. *Critical Inquiry* 47(S2): S58-S62.
- Merleau-Ponty, Maurice
-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olin Smith.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 Mok, Chit Wai
- 2022 Violent Repression, Relational Positions, and Emotional Mechanisms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Movement. *Mobilization* 27(3): 297-317.
- Mol, Annemarie
- 2021 *Eating in The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Henrietta
- 2011 *Still Life: Hopes, Desires and Satisfactions*. Cambridge: Polity.

My Little Airport

2019a 煙 (歌曲) [Smoke (Song)]. 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Q4nDqvUj-A>,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2019b 吳小姐 (歌曲) [Miss Ng (Song)]. 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2hbclzXc>, 2025年7月14日取用 [Accessed July 14, 2025].

Neimanis, Astrida

2013 Feminist Subjectivity, Watered. *Feminist Review* 103(1): 23-41.

Nieuwenhuis, Marijn

2016 Breathing Materiality: Aerial Violence at a Time of Atmospheric Politics.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dx.doi.org/10.1080/17539153.2016.1199420>

2017 Atmospheric Governance: Gassing as Law for the Protection and Killing of Lif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doi.org/10.1177/0263775817729378>

Povinelli, Elizabeth A.

2011 *Economies of Abandonment: Social Belonging and Endurance in Late Liber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Routledge, Paul

1997 *Space, Mobi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dia's Naxalite Move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12): 2165-2189.

Serres, Michel

2018 *The Birth of Physic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Sloterdijk, Peter

2009 Airquak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7(1): 41-57.

2016 *Foams. Spheres Volume III: Plural Spherology*. Los Angeles: Semiotext(e).

Tilly, Charles

2008 *Contentious Performa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ng, Tin Yuet

2020 From 'Be Water' to 'Be Fire': Nascent Smart Mob and Networked Protests in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9(3): 362-368.

Wu, Helena

2022 Be (Like) Water: Media Dynamics and Multiple Realities. In *Concepts: A Travelogue*. Bernd Herzogenrath, ed. Pp. 75-86.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Wainwright, Megan

- 2017 Sensing the Airs: The Cultural Context for Breathing and Breathlessness in Uruguay. *Medical Anthropology* 36(4): 332-347.
- Zee, Jerry C.
- 2022 *Continent in Dust: Experiments in a Chinese Weather Syste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梁皓晴

106319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ronexlhc@gmail.com

Theorising “Movement” in Atmospheric Policing:

Affective Subjectification and Somatic Engagements in the Hong Kong Be Water Revolution

Ho-ching Leu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ear gas has become a prevalent tool of atmospheric policing in contemporary urban security. By infiltrating the air, it renders the body vulnerable, enacting a suspension of citizenship through the act of “breath-taking”. Building upon political geographer Mikko Joronen’s (2023a) concept of *negative sphere-dwelling* and anthropologist Tim Ingold’s (2010) discussions of *dwelling, wayfaring, and perceiving within the weather-world*, this paper redirects analytical focus to the very *movements* that emerge within and through atmospheric violence. It examines how protesters in the Hong Kong Be Water Revolution (2019–2020) navigated the conflict-ridden urban atmospheres, giving rise to diverse trajectories of *affective subjectification*.

Drawing on affect theory in general and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 articulated by feminist theorist Sara Ahmed (2006) and anthropologist Annemarie Mol (2021) in particular, I explore how protesters undergo bodily transubstantiation in the face of tear gas. Rather than viewing atmospheric policing solely as an oppressive apparatus, I argue that it also has a generative dimension. Protesters entangled with tear gas are shaped by their encounters with atmospheric turbulence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giving rise to dynamic processes of reorientation that open up shared affective spaces of *breathing-together* (同呼吸 *tung4 fu1 kap1*).

Central to this analysis are two material metaphors — *eating tear gas* (食催淚彈 *sik6 ceoi1 lei6 daan2*) and *resisting like water* (如水抗爭 *jyu4 seoi2 kong3 zaang1*) — which illuminate two key modes of body–environment co-constitution: (1) *breathing–affective embodiment* and (2) *somatic–material engagement*. On the one hand, protesters’ initial encounters with tear gas

provoke affective disorientation and fear, which gradually unfold into ethical imaginaries emerged through involuntary breathing, spontaneous care, and 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Be Water Revolution engenders subversive and radicalised bodily practices in tandem with strategic crowd mobilities. Protesters traverse the urban landscape in guerrilla-like fashion, evading police encirclement and attuning themselves to high-risk environments, while simultaneously reconfiguring the social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urban space.

The motto *resisting like water* signifies not only tactical adaptability, but also the fluid reconfiguration of protest subjectivity and perception of bodies-in-motion. Such transformation unfolds along two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first, a *material reorientation*, wherein protesters appropriate everyday objects as resistant matters; and second, a *spatial reorientation*, through which the body cultivates differentiated and fine-grained geographical sensibilities and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via embodied movement.

Hence, although tear gas aims to temporarily “clear” or reoccupy space by constraining breath, the potentialities of *movement* remain far from exhausted. Protesters subjected to atmospheric violence are not reducible to bare life; they continuously negotiate and recalibrate their relations with socio-material environments. Significantly, seasoned protesters begin precisely from the vulnerability of sphere-dwelling, enacting creative forms of resistance through coordinated actions across both digital and physical terrains. In doing so, they are capable of transforming the affective intensities of atmospheric policing into generative forc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mobilisation.

Thus, material metaphors such as *eating tear gas* and *resisting like water* provide a critical lens for reconsidering the dispersed and relational nature of political agency within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By foregrounding breath and material entangle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down-to-earth” theorisation of *movement in atmospheric policing* that challenges both structurally rigid and static models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highlighting instead the dynamic co-constitution of bodies, materialities, technologies, and atmospheres.

Keywords: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 atmospheric policing, social movement, the Hong Kong Be Water Revolution, affective subjectification
